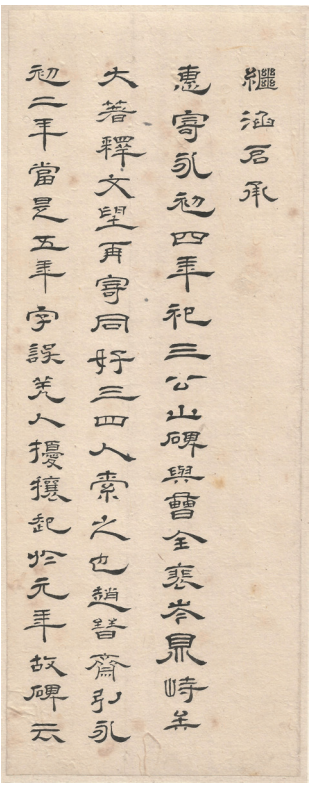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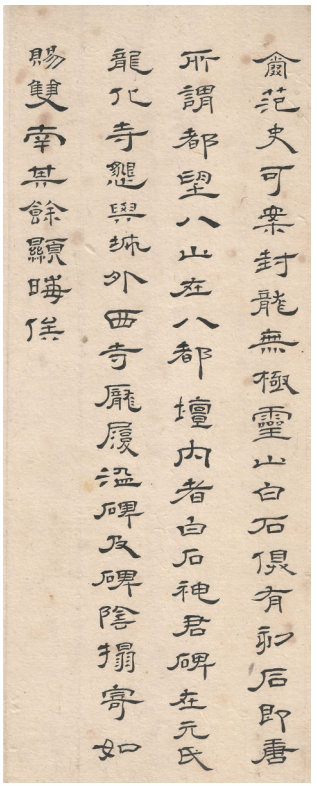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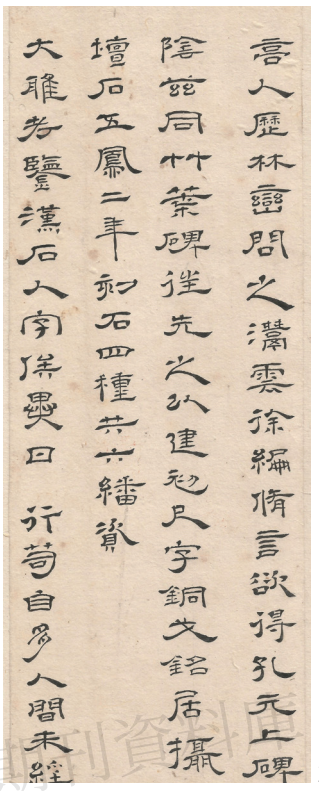

1

繼涵名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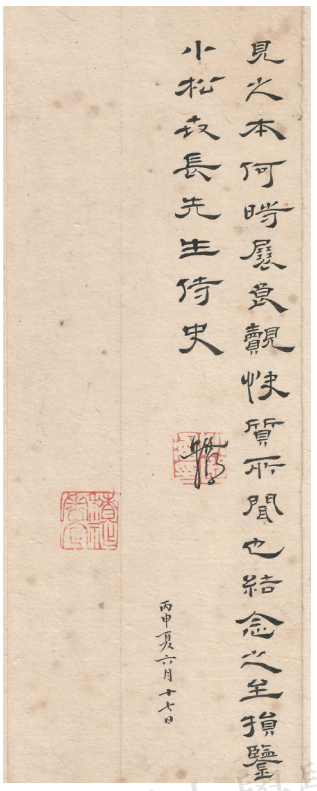
憲寧元初四年祀三公山碑與曹全裒岑景時等
大著釋文望再寧同好三四人索之也趙晉齋引元
初二年當是五年字誤矣人擾攘乱於元年故碑云


2

禽范史可案封龍無極靈山白石僅有刻石即唐
所謂都望八山在八都壇内者白石神君碑在元氏
龍化寺魏與城外西寺厩屢溢碑及碑陰攔寧如
勝雙峯其餘顯晦係


3

高人歷林壑問之灑雲徐緼脩言欲得孔元上碑
陰並同竹葉碑從先父公建初尺字銅文銘居攝
壇石五鳳二年刻石四種共六幡資
大雅考鑒漢石人倫係興曰 行筍自多人間未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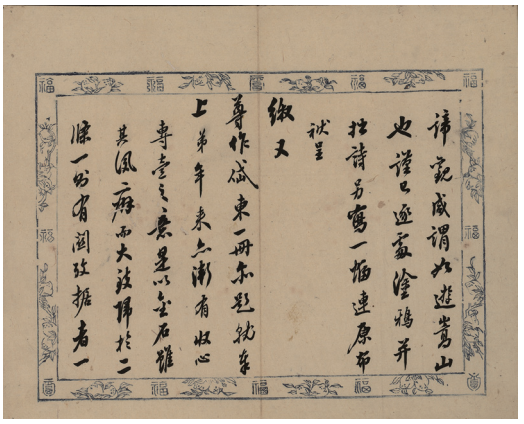

4

見示本何暇屢竟觀快覽所聞也結念之至猶鑒
小松叔長先生侍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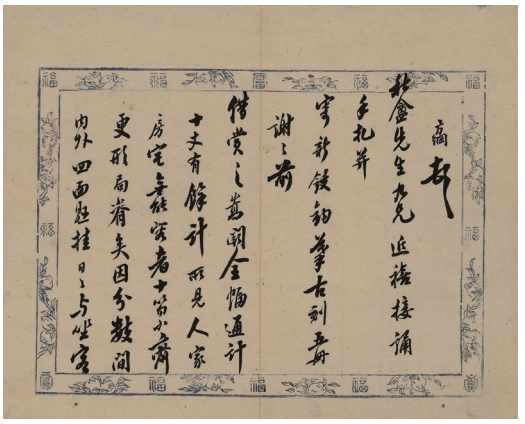
丙申夏六月十七日

孔繼涵 《致黃易》 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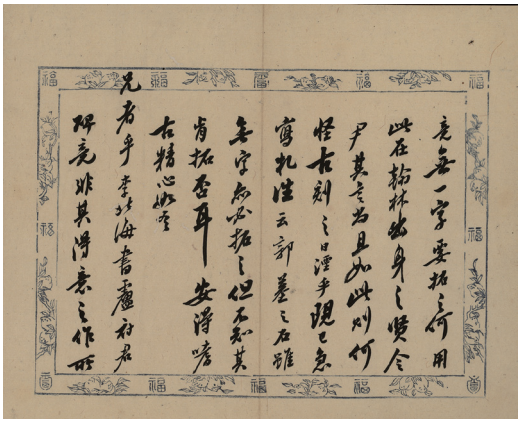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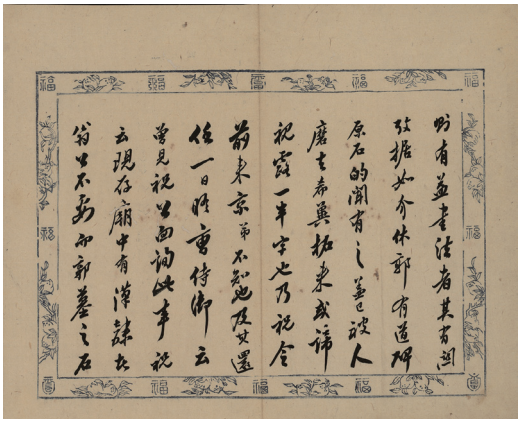
2



1



4



3



6



5

翁方綱　《致黃易》　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OI: 10.6541/TJAH.201903_(46).0003

黃易金石收藏中的地方官

薛龍春*

【摘要】乾嘉時期，無論是參與金石收藏的人數，還是收藏的範圍、類目、數量等，都遠遠超出清初的規模。在時人的眼中，黃易的收藏最為引人矚目，他官至山東運河同知，位階不高，並沒有特別的政治資源，但他在短短三十年中積累了五千餘件拓片，其中不少原物在陝西、四川、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廣東、新疆等距山東較遠的省份。在沒有成熟市場的情形下，迅速徵集全國範圍內的金石拓片如何成為可能？本文在研讀黃易與友人大量往來通信的基礎上，發現在黃易所編織的人際網路中，地方官對於拓片徵集具有重要貢獻。作為某一區域的行政長官，地方官在打探金石資訊、遣人椎拓或是提供拓碑幫助等方面，都有充分的權力與便利。我們還進一步發現，黃易任職所在的濟寧是運河的樞紐之一，為經過此地的各地官員及其親眷、友人提供放行、護送或是接待服務，是黃易委託拓碑的契機或是回報之一。而他在書畫篆刻領域的聲名，也使得他在應酬外界時，比翁方綱、孫星衍等人僅能書法具有更大的優勢。無論是主動的饋贈還是被動的回報，他的作品無疑是地方官為之操辦拓片的動力。

關鍵詞：乾隆、金石收藏、拓片、黃易、地方官

引言

雖然在翁方綱（1733－1818）等人的記載中，京師琉璃廠等地時有拓片出現，① 但乾嘉時期尚未形成較為完備的文物市場，沒有海量的拓片懸諸市肆供人任意挑選。每一張拓片的獲得，收藏家都需要透過不同的中介。因此，徵集網絡的編織，顯得尤為重要。缺乏與外界的廣泛互動，不僅信息不能周知，也無從委託相應的操辦人選。

＊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 教授

① 翁方綱曾在那裡買到《孫秋生等造像拓本》，見翁方綱，《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令人深感興趣的是，僅僅官至運河同知的黃易（1759－1844）透過怎樣的管道迅速建立他的金石收藏？本文試圖根據新見數百封黃易友朋往來書札，重構地方官在黃易金石收藏中的重要作用，黃易如何回報他們，則是本文關心的另外一個問題。②

一、局面的打開

有關乾嘉金石學最為鮮活而又恰如其分的概括，來自廣東番禺的潘有為（1743－1821）。潘於1772年考中進士，任內閣中書，是翁方綱學術圈的一位重要成員。1777年十二月三日，他在寫給黃易的信中深有感慨地說：「可知金石亦時尚也！」③（圖1）這番感慨源於黃易向翰林院編修潘庭筠（1778年進士）索要《漢校官碑》拓本，然其人所藏若干本早已為人索要一空。

雖說此一時期的文人對於拓片的追逐，尚不能用「舉國如狂」來形容，但既被稱為「時尚」，說明金石已不再是少數古物鑒賞家的專利，文人間普遍流行賞玩拓片，並將之視為文化身份的某種象徵。古代的金石遺文，歷千百年而不滅，其間點畫字句之同異，足以證經，銘勳之刻、藏幽之文，又多與史傳相表裡，而書法之美亦得以附庸。在當日的學術圈，如果一位文人對於金石文字沒有辨識與利用能力，等於沒有掌握與他人溝通的密碼，也就無法參與到學術對話乃至時尚話題之中。即使是作為風雅的禮品，金石拓片在十八世紀三四十年代以後也變得炙手可熱。

錢泳（1759－1844）曾經兩次拜訪黃易，在比較了同時十數位金石學家之後，他聲稱，黃易收藏精而且博，四海好古之士莫不延頸願交：

> 泳竊見近日好古家如翁宮詹覃溪、家侍講辛楣、安邑宋氏、洛陽武氏、陽湖孫淵如、陽曲申鐵蟾、歙之程雪齋、巴慰祖、杭州之趙晉齋、何夢華、海鹽之張芑堂、長洲之陸貫夫之數君者，皆當世所謂博雅之士也。觀其所

② 關於黃易金石拓本的來源，秦明曾指出四個類別：訪碑所得、遣工拓取、親友寄贈、出資購買，但他沒有提到地方官的特殊作用。參見秦明，〈黃易的漢魏碑刻鑒藏〉，收入《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26-31。

③ 潘有為，《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藏金石，搜羅且遍天下，琳琅甲乙，著錄盈笥，多者至三千餘種，此歐趙以後所未聞者。然就其中博采不精者有之，一隅難遍者有之，而執事以為政餘閒，能修廢起頓，補古人之所不及，如立《武梁畫像》，出《范巨卿碑》，使四海好古之士靡然向風，皆欲交於執事。④

在這封寫給黃易的信中，錢泳提到了翁方綱、錢大昕（1728－1804）、宋葆淳（1748－？）、武億（1745－1799）、孫星衍（1753－1818）、申兆定（1762年舉人）、程敦、巴慰祖（1744－1793）、趙魏（1746－1825）、何元錫、張燕昌（1738－1814）與陸紹曾（1736－1795），幾乎囊括了當日最重要的金石收藏家，他們大多也是黃易的直接友人。錢泳的看法代表了時人對於黃易的普遍評價。

黃易字小松，又字大易，浙江錢塘人。15歲起跟隨長兄黃庭（1729－1780）坐館湖北漢陽一帶，1765年黃庭緣事遣戍新疆，黃易旋里負米養母，但不久他又前往固安、武岡等地謀生。1770年代初，他成為鄭制錦幕中的師爺，鄭時任鹽大使，駐鹽城伍佑場。⑤ 由於揚州在清代鹽業中的特殊地位，黃易也時常往來揚州。此後鄭氏遷直隸南宮知縣，又調清苑知縣，黃易則隨其遷徙流轉。1777年秋，在鄭制錦的幫助下，黃易循例報捐，獲得成功，⑥ 次年分發東河，效力於河工。此後的二十餘年間，黃易歷升東平州州判、蘭儀同知、運河同知，並在去世前一年兩次以同知代理運河道道台事。

在友人的描述中，黃易雖然矩步蹣跚，但說話清高剛直，行事頗有大義。⑦ 他通曉水利，是一位幹練的河道官員，為歷任上司所倚重。但在當日的金石

---

④ 錢泳，《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七冊。

⑤ 鄭制錦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恩貢舉人，就職鹽大使，分兩淮，歷新興、伍佑二場，總鹽以卓異薦，遷直隸南宮知縣，轉清苑，後陞真定知府，擢甘肅按察使，未行，就補直隸布政使，未幾，署倉場總督，卒。參見蔣啟勳修、汪士鐸纂，《（同治）續纂江寧府志》（清光緒六年刊本），卷十四之三，《人物》，頁22-23。

⑥ 報捐意為納捐若干，報請取得某種官職。黃易報捐，王宗敬《我暇編》為黃易所作傳記稱「由川運例捐從九品」，《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179冊，頁389。

⑦ 何道生，《雙藤書屋詩集》，卷十，《至沛寧喜晤黃小松司馬易》，《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481冊，頁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圈，他的本職往往為人淡忘，使人印象深刻的反而是他對金石的癡迷，以至於不少人稱他為「碑癡」：

> 錢大昕題詩：二千年中圖十二，合呼黃九作碑癡。
> 何道生題詩：難得碑癡即大癡，生平快事聚於斯。
> 魏成憲題詩：碑癡墨癖是多才，秦漢遺文未劫灰。⑧（圖2）

事實上，在近三十年中，黃易積累了超過五千種以上的碑帖，其中不少宋拓舊本，因而是這個時期聲名最為顯赫的金石收藏家。⑨

值得注意的是，1774年元氏縣發現《祀三公山碑》，對於黃易而言意義重大。在他與當日金石圈精英的交往中，此碑的拓片起到敲門磚的作用。儘管這塊碑既不是他訪得的，那些拓片也不是他椎拓的，但《祀三公山碑》的發現始終與黃易之名聯繫在一起。

在《祀三公山碑》發現之後，黃易曾刻白文印「小松所得金石」，這方印章時常鈐蓋在他後來所得到的拓片之上。⑩ 此印邊款云：「乾隆甲午（1774）秋，得《漢祀三公山碑》於元氏縣，屬王明府（即元氏知縣王治歧）移至龍化寺。」⑪（圖3）給人的印象是，這塊碑是黃易在1774年秋天發現並要求縣令移到寺廟中加以保護。而黃易在給朱筠（1729－1781）寄贈拓本時，附信中卻是這麼說的：「甲午，陝西王某知元氏縣，得此刻於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⑫ 時間與印款所言一致，但發現者變成了知縣王治歧。關於此碑的

---

⑧ 黃易，《得碑十二圖》，天津博物院藏。

⑨ 王宗敬《我暇編》所收《黃小松》云：「集宋以上碑帖過五千種。」，頁389。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三，《黃秋盦傳》則稱其「所蓄金石甲於一時」，《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頁472。

⑩ 如黃易舊藏《裴岑紀功碑冊》，就多次鈐蓋了「小松所得金石」一印。國家圖書館藏。

⑪ 類似的說法見於黃易，《秋盦題跋》，「三公山碑」條，《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頁19。

⑫ 朱筠，《笥河文集》，卷六，《漢三公山立壇刊石文跋尾》稱黃易為之釋文，闕六字，朱為之補釋異同近二十字，因別錄一本，止闕二字。《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66冊，頁492-4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發現，《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也有類似的記載：

> 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略》，長吏搜古碑上之朝，關西王君（治岐）宰元氏，得此刻於城外野坡。……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命易辨識。⑬

所言「三通館方輯《金石略》」，是指乾隆十二年（1747）設續文獻通考館，續纂馬端臨《文獻通考》，至1767年該書告竣後又敕令補輯《通志》、《通典》二書，因開三通館，特別要求「六書、金石、草木、蟲魚等略，又宜博采旁搜」。⑭《祀三公山碑》的發現當即其時之事。

然而在1793年所作《得碑十二圖》〈三公山移碑圖〉的題識中，黃易卻聲稱他在南宮知縣幕中，吳興人楊鶴洲時館於元氏，黃易煩其訪碑，1775年得《祀三公山文》。而據黃易《楊兄鶴洲購贈元氏贊皇石刻，有漢篆〈三公碑〉，甚奇，喜極，復求沈君愚溪覓之》的詩題，楊鶴洲不過購贈了《祀三公山碑》的拓本，而為黃易尋訪此石的則是沈愚溪，據「官閣有休文，神交託心素」之句，很可能也是一位地方官員。⑮

不論發現時間是1774還是1775，也不論是王治岐、沈愚溪還是楊鶴洲擁有真正的發現權，總之黃易因為事務羈絆，從未親至元氏縣訪拓此碑。然而1794年內閣中書李鼎元（1778年進士）諮詢《祀三公山碑》的發現原委時，黃易卻再一次聲稱：

> 弟得此石於直隸元氏縣野陂，囑知縣王君移置縣城龍化寺內，與《漢白石神君碑》對峙，此原委也。⑯

---

⑬ 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三公山碑」條，《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第1冊，頁615。

⑭ 《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上。此際翰林學士邵晉涵纂書三通館，檄取海內石刻進之內廷編書，以續鄭樵《金石略》。孫星衍，《寰宇訪碑錄》自序，《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第26冊，頁19851。

⑮ 黃易，《秋盦詩草》，《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頁8。

⑯ 黃易，《致李鼎元》，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當人們談起這塊著名的碑石時，黃易是唯一的發現者，另外三位或許更為直接的人物反而湮沒無聞。如張塤有「黃生黃生爾亦訪得元氏碑」之句，小注逕稱：「《漢三公山碑》，小松訪得元氏野中，今移龍化寺。」⑰

除了黃易模棱兩可的說法，他被認為是《祀三公山碑》的發現者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不斷以他的名義向外寄贈該碑的拓本，尤其是京師的金石圈。

此時京中最著名的金石學者非大興人翁方綱莫屬，此前他視學廣東，得拓片500餘種，於1771年完成《粵東金石志》一書。回京之後，他還用廣東所得之碑的副本，交換朱筠此前督學安徽學時所得的拓片。朱筠在督學安徽時期，編有《安徽金石志》三卷。⑱ 自1776年起，黃易通過友人陳焯與王復（1747－1797）向翁方綱、孔繼涵（1739－1783）、王昶（1725－1806）、朱筠等京中金石名家寄贈包括《祀三公山碑》在內的各種拓本，以求結納。《得碑十二圖》〈三公山移碑圖〉翁氏對題有云：「始自無軒子，傳來上谷書。」可知幫助黃易向翁方綱傳遞信件的乃是陳焯，陳焯是浙江烏程人，受知於內閣學士王杰（1725－1805），挈之入都，得一時名公卿引重。此後他在直隸保陽任教職，與黃易稔熟。在一封寫給黃易的信中，陳提到：「佳刻二印接到後摩挲半夜，次早即寄與翁學士去矣。」⑲ 王復是浙江嘉興人，坐館起家，為國子監生，1773年在伍佑場與黃易結交。黃易曾通過他向王昶奉上「小冊並碑刻」，這裡所說的碑刻極有可能是《祀三公山碑》拓本。在這封信中，王復還向翁方綱轉

⑰ 張塤，《竹葉庵文集》，卷十七，《黃小松主簿易畫〈得石圖〉，為李君鐵橋東琪在濟寧學宮古松樹下掘得〈漢膠東令王君廟碑〉作也，小松寄圖乞題此詩》，《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75冊，頁103。關於這一問題的討論，參見桑椹，《東漢〈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傳及其後世影響》，收入秦明主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2012），頁285。

⑱ 朱筠，《笥河詩集》，卷十二，《覃溪前輩以詩附粵東金石十餘通見贈，且索余安徽所拓石本，依韻奉答》，《續修四庫全書》，第1439冊，頁622。詩作於1774年。朱筠在1781年去世，與黃易交集不多。

⑲ 陳焯，《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呈黃易所刻「小蓬萊閣」一印，翁此際亦以「小蓬萊閣」顏其居。⑳（圖4）

僅僅隔了一年，黃易因循例報捐赴選入都，得與翁方綱、翁樹培（1764－1809）父子及王昶、朱筠、孔繼涵、張塤（1731－1789）、錢坫（1744－1806）、宋葆淳、潘有為、潘庭筠、余集（1738－1823）等人相見，並很快被他們引為知己。與翁方綱、孔繼涵等人的交往，為黃易的金石收藏打開了局面。在1776年寫給羅聘（1733－1799）的信中，黃易自信地聲稱「直隸碑十得八九」，㉑而在稍後寫給趙魏的信中，黃易更是信心滿滿：

> 孔廟弟可盡得，不須再覓。因聖裔孔太史葒谷交好，自能盡致。葒谷博雅君子，好古亦類兄者。㉒
>
> 弟承孔葒谷見知，許以東魯之碑與弟相易，大都可以盡得。中州金石已託學使及盧氏令，或可不虛。蜀中金石託成都太守（煙客先生之孫，漢陽舊主人也）。㉓（圖5）

他所委託拓碑的河南學使是大興人邵庚曾，很可能出自翁方綱的介紹，盧氏縣知縣趙鈞彤、成都府知府王漪都是地方官員，孔繼涵既是京官，又是曲阜的地方大族。有了這些官員的幫助，直隸、曲阜、中州、四川等地的金石，黃易似可唾手而得。

如同黃易所預期的，孔繼涵很快贈以濟寧新出的漢碑《王君廟門斷碑》及《金鄉石室畫像》的拓本，此外還有《孔元上碑陰》、《竹葉碑》，以及《建初尺字》、《銅戈銘》、《居攝壇石》、《五鳳二年刻石》等四種六套。㉔（圖6）而四川華陽知縣張素曾告知的成都南門外武侯祠後殿有漢隸斷

---

⑳ 黃易，《致王復》，見秦明等編，《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頁170-171。相關討論參見秦明，《黃易「小蓬萊閣」印沿用考》，《西泠藝叢》，2017年第9期，頁9-19。

㉑ 黃易，《致羅聘》，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60。

㉒ 黃易，《致趙魏》，張廷濟錄本，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43。

㉓ 黃易，《致趙魏》，上海圖書館藏。

㉔ 孔繼涵，《致黃易》，私人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碑一片，㉕ 成都知府王漪查勘後並無下文，不過他只給黃易寄來了唐碑《鮮于里門》。㉖ 到1780年，黃易已經集藏碑版拓本近千種，與濟寧本地最重要的藏家李東琪不相上下。㉗

二、地方官

地方官的重要性，清初學者就已深有體會。曹溶（1613－1685）注意到陝西官宦驅使民眾大量拓碑，荒廢了農耕井鑿，㉘ 但有些拓本，離開他們的幫助幾乎無法致得，顧炎武（1612－1682）致書顏光敏（1640－1686）時曾經談到：「碑洞中石經及漢唐字，但有錢即可買，不必用官府，惟各州縣古碑，非官府不能致。」㉙ 這裡所說的「各州縣古碑」，當是集中於州縣學宮之中的碑刻，沒有官方的允許或是合作，無法椎拓。而顏光敏的家鄉山東，是漢碑最富的省份，根據他的觀察，拓本常常是地方官員歲貢的尤物。㉚ 不過，也有地方官因

㉕ 張素，《字條》，《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此幀便條無署名，黃易頁邊注「華陽明府張君素所記」。據陳法駕修、曾鑒纂，《（民國）華陽縣誌》（民國二十三年刻本），卷六，《職官二》，張素，貴州人，進士，乾隆二十一年（1756）至二十七年（1762）任四川華陽知縣，頁1。其時黃易坐館楚北。

㉖ 黃易，《致趙魏》，上海圖書館藏，收入梁穎整理，《龐虛齋藏清朝名賢手札》（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第四冊，頁882-885。

㉗ 李佐賢輯，《武定詩續鈔》（清同治六年利津李氏刻石泉書屋全集本），卷七收李衍孫《得石圖詩為家鐵橋作即示黃九》小注，頁12b-13b。

㉘ 曹溶，《靜惕堂詩集》（清雍正三年刻本），卷六，《資耀寰入秦，託其拓寄碑本》，頁7-8。

㉙ 顏光敏輯，《顏氏家藏尺牘》，卷一，《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第89冊，頁414。

㉚ 顏光敏，《樂圃集》，卷二，《漢韓敕修孔廟禮器碑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7），集部第218冊，頁331。江南盡管碑刻較少，但同樣也有這種風氣，林侗，《來齋金石文考略》「吳・天發神讖文」條云：「丁丑仲春，予客上江幕府，撫軍陳公琳望有事江寧，予告之曰，有一紙之微，非藉節鉞之重，莫能得。因囑以此碑。旬時歸，餉予二紙，越半月，江寧太守又呈六紙，悉歸於予。」《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第8冊，頁59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厭苦上司不斷委派拓碑而故意毀壞碑板，孫承澤（1593－1676）對此曾不無擔憂：

> 秦中石刻自經寇亂禍，焚蕩無餘。間有存者，州縣憚於上司之索取，乘亂捶毀。恐此後秦無石矣。㉛

十八世紀後期，畢沅（1730－1797）撰《中州金石志》，畢沅、阮元（1764－1849）合撰《山左金石志》，都曾動用地方官員的力量。如孫星衍在給黃易的信中，談到畢沅囑他寫信催取各縣碑碣，此時所得已經相當可觀，而偃師一地又新補送數碑。㉜ 段松苓《山左碑目》序言則說：「歲乙卯（1795），畀餘搜采志乘，開列其目，札致守土者氈墨郵寄焉。」㉝ 這本碑目作為《山左金石志》的基礎，正是志乘所載碑刻與州縣拓寄碑刻的綜合。參與編撰此書的江鳳彝（1798年舉人）也在給友人的信中談到，岱宗各刻學使阮元已開單託諸泰安縣知縣蔣予林，其他「各府並已札致搜羅，願望甚奢，未識諸能應手否？」㉞（圖7）

作為某一區域的官員——如畢沅曾任陝西巡撫、河南巡撫、山東巡撫與湖廣總督，阮元曾任山東學政、浙江學政、浙江巡撫等——他們可以以行政權力要求該區域的州縣官員為他們拓取碑刻，他們所編撰的區域金石著作，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地方官的合作。但是，一旦離開這一區域，畢、阮等人的行政權力便難以起作用。而官位甚卑的黃易，卻能夠動員各地地方官為他操辦拓碑之事。

㉛ 孫承澤，《庚子銷夏記》，卷五，《郃陽令曹全碑》，見《中國書畫全書》（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1998），第7冊，頁779。孫氏所描述的情形為秦人王宏度告知。

㉜ 孫星衍《致黃易》：「中丞又屬弟札催各縣碑碣，《中州金石志》一書諒可成就，所得亦已可觀也。偃師新補送數碑，今寄呈數種，其《竇叔向碑》及《周公祠碑記》尊處已有，故不以奉寄也。」故宮博物院藏。

㉝ 段松苓，《山左碑目》，國家圖書館藏。

㉞ 江鳳彝，《致顏崇榘》，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早在直隸時期，黃易搜碑就得到本省地方官的幫助。前文提到的元氏知縣王治岐與另外一位官員沈愚溪，在《祀三公山碑》的發現與保護中具有直接的作用。饒陽知縣王鳳文曾為黃易奉上石刻拓本二種，自稱「土物」。㉟ 南和知縣吳璟受黃易委託尋訪隸書碑刻，於縣東嶽廟中發現隋代開皇、大業二碑，形跡雖已剝落，然尚堪墨拓。㊱ 靈壽縣署的師爺張中受黃易之囑為拓取當地古碑，其中《渤海太守碑》碑額略有字跡，然碑文則剝落不堪，雖可椎拓，但只存姓名。另一塊《北齊趙郡王碑》，乾隆二十八九年間曾經拓過，並無顯有一字，因在深山僻遠，稍費跋涉，他將覓機再作嘗試。㊲

這些官員對於碑刻是否有興趣，我們不得而知。但另外兩位知縣——周震榮（1730－？）與潘應椿（1759年舉人），則與黃易有共同的愛好。周震榮是浙江嘉善人，在擔任清苑縣丞時與黃易過從甚密，1775年攝篆曲陽縣，黃易委託他訪拓本地碑版，周為拓致唐代五通，北宋三通，稍後再得宋祥符《北嶽醮告碑》以及《金輪石幢》。㊳ 豐潤知縣潘應椿，安徽歙縣人，他的姨兄程瑤田（1725－1814）是大儒江永（1681－1762）的弟子。潘應椿在易州龍興觀中得唐景龍、景福《道德經》兩石刻，皆一碑兩面。又在唐山縣宣嵓山發現貞觀《石刻佛經》與北魏碑刻，都是宋代以來的金石家未曾著錄的。㊴（圖8）1777年上半年，潘又告知，豐潤人王安昆獲歐陽詢（557－641）楷書《九歌》與草書《千字文》殘石，後刻周越（970以後－？）題字云：「此歐陽詢草跡也，所謂

㉟ 王鳳文，《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

㊱ 吳璟，《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小蓬萊閣金石目》：「《大隋洺州南和縣澧水石礄碑》，八分書，篆額，開皇十一年；《大隋邢州南和縣澧水石□碣□累文碑》，八分書，篆額。右二碑在直隸南和縣儒學。乾隆乙未（1775）知縣吳璟拓寄。」南京圖書館藏鈔本。

㊲ 張中，《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根據《小蓬萊閣金石目》的記載，二碑本年皆已拓得。這兩個拓本此後為武億假取，參見《授堂金石文字續跋》，卷二，《張府君殘碑》，《趙郡王高叡碑正書天保八年在靈壽縣祁林院》，《續修四庫全書》，第892冊，頁648、651。

㊳ 周震榮，《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第六冊。《小蓬萊閣金石目》亦云：「《行唐邑龕妙法蓮花經觀世音普門品》，乾隆乙未，周司馬箕谷攝曲陽令時拓得。」

㊴ 潘應椿，《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旱蛟得水，毚兔走穴，信不虛耶。」㊵ 黃易考證周越為宋人，故對此碑為北宋所刻深信不疑，他立即遣工前往椎拓，帶回大量拓片。㊶ 這些拓片，成為黃易本年赴選在京時應酬人事的稀罕禮物。當年十一月，他告知潘氏，歐陽詢的兩種碑刻都中一時紙貴，所拓數十部已全部為人索去，懇求潘氏續拓時再寄惠十來部。㊷ 在稍後的通信中，潘不斷向黃易寄送拓本，除了九部歐帖，㊸ 他還為黃易索得揚州徐氏所藏古銅盤銘一通，「篆法古雅，不減《石鼓》，相傳春秋時物，蓋盟會歃血時所需器也。」這件銅盤銘，就是著名的《散氏盤》。㊹

1778年正月，黃易分發濟寧，成為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1783）的幕僚。蒞任濟寧之初，他的父執直隸新安知縣申發祥就寫信給山東東平知州洪哲燕：

> 揀發河工小松黃君，乃老友松石令嗣，心靈手敏，兼擅筆墨之長，尤癖嗜金石，到處刳苔剔蘚，如椎埋胠篋，一見自當把臂入林，不得徒以奄捐中輕視雅人也。㊺

河工在清代是對治理江河等水利工程的總稱，它同時也是一個人群概念，從事於此的低級官員與倅丞都被稱為河工。在兩地地方官員的通信中，河工黃易對訪碑的酷愛被特別加以介紹，申氏希望在他就任之後，洪氏能多加關照。

黃易在山東的拓本徵集活動，得到本地官員的鼎力相助。1778年春，黃易剛剛到任不久，萊州知府胡德琳（1752年進士）即贈以《唐摩崖碑》一副，並表示《琅琊臺秦碑》、濟寧新出漢碑、樂陵劉氏碑、《元魏刁遵墓銘》以及李

㊵ 黃易，《秋盦題跋》收《跋歐陽小楷》，頁21。《小蓬萊閣金石目》亦云：「歐陽詢小楷《九歌》殘石，歐陽詢草書《千文》殘石，後有宋周越題字，在豐潤縣。乾隆乙未易與知縣潘應椿拓得。」

㊶ 1779年二月，黃易於蘭陽官舍跋歐陽詢《九歌》、《千字文》，國家圖書館藏。

㊷ 黃易，《致潘應椿》，上海圖書館藏。

㊸ 潘應椿，《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五冊；黃易，《致潘應椿》，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178。

㊹ 潘應椿，《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㊺ 申發祥，《致洪哲燕》，《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陽冰《庾公德政碑》，他都可以提供。㊻ 胡德琳來自廣西，是袁枚的堂妹夫。同一年，任城書院山長、秀水人盛百二（1720－？）接到黃易來信，立即安排拓取《鄭固碑》、《范式碑額》，此時《范式碑》碑身尚不可得，盛百二正懸賞以購，他相信這一消息會讓黃易喜而不寐。此外，濟寧普照寺金剛腳下，盛百二也根據黃的要求前去勘察，不過探之無字，惟「元貞二年」四字而已。㊼ 盛百二頗留心金石，他的《柚堂筆談》中有不少關於金石的題跋。1784年夏，黃易在知縣馬于荃的幫助下，剔出濟寧州屬縣金鄉石室畫像的淤泥，發現有「朱長舒之墓」及「金五」等字，最後一石題字四行，又露出「漢朱氏鮪嘉亭萬吉祥」等字。㊽ 1786年八月，黃易升濟寧州學《鄭季宣碑》，得到知州劉永銓、州判王所禮的協助。㊾ 1791年，東昌同知吳人驥為黃易拓得顏真卿碑、學宮《三絕碑》以及鄧氏所刻顏真卿《祭侄文稿》。㊿ 吳本身收藏書畫，對於印章也興趣濃厚。1794年，泰安知縣江清為黃易拓徂徠石刻各種，並一一注明所處位置，這為黃易後來編目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在稍後一信中，江清確認所謂《孫夫人碑》實係《晉任城太守夫人孫氏之碑》，「十一隸字，作三行，前為俗匠遺漏，今又專工去拓數十本。」並告知《宮山漢武碑》約明後日可到，一旦到後，當即飛呈數本。(51) 江清是黃易的杭州同鄉，他和兒子江鳳彝都喜好搜訪碑刻，江鳳彝後來成為黃易的學生。

黃易委託他省地方官員拓碑的情況更多，這些官員大多是在經過濟寧時接受了委託。1785年，陝西沔縣知縣李衍孫告知黃易，「委拓漢中、成縣各石刻，已如命辦全」。(52) 居官陝西期間，李衍孫曾收藏過一本《華山廟碑》，在

㊻ 胡德琳，《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

㊼ 盛百二，《致黃易》二札，《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五冊。大致與此同時，黃易也向江德量提及此事：「《鄭固》下方《范式碑額》已煩李君鐵橋拓取，許於數日即寄。普照橫嵌一碑，有元（貞）年號者，至今未出。」《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二冊，故宮博物院藏。

㊽ 見《小蓬萊閣金石目》。黃易《得碑十二圖》〈金鄉剔石室之圖〉題識與此稍異。

㊾ 《鄭季宣碑》有乾隆五十一年（1786）八月十六日黃易題刻，濟寧博物館藏。

㊿ 吳人驥，《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二冊。

(51) 江清，《致黃易》二札，皆收入《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52) 李衍孫，《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一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金石圈中頗為知名。[53] 1787年，河南武陟知縣盧又紳甫一到任，就開始為黃易訪求碑板：

> 敝縣所有諸名跡，訪之故老，無一知者，弟以初到未久，容再細詢明確，但有殘斷遺跡，無不力為訪求也。[54]

1785－1787年間，湖南湘潭知縣方維祺受黃易委託，為拓《黔安銅柱碑》與《北海碑》。[55] 1792年，直隸正定知府邱學敏受黃易委託拓碑，聲稱此事定須自己親為指點，不得概付之傭工下隸，必求數日之暇，為之捫苔剔蘚。[56] 1794年，王復署篆河南臨潁縣，黃易以三國隸碑相託，王在回信中說：

> 《受禪碑》親至其處，摩挲數遍，實有三字在上，現在命工摹拓。《上尊號碑》有陰而無側，現亦拓取。[57]

事實上，黃易此前已藏一件《受禪碑》拓本，為乾隆壬寅（1782）二月臨潁知縣裘某寄贈。[58] 同樣是在1794年，黃易也曾託河南安陽縣知縣趙希璜（1746－1805）為覓《西門府君碑》，趙在《寄黃小松司馬》「殷勤下訪西門豹，片石猶留渤海高」句的小注中寫道：「小松託拓《西門府君碑》，碑陰有僕射趙郡元韶名，應是東魏時高歡所建。」[59] 1795年，江蘇宜興知縣唐仲冕（1753－

---

[53] 《武定詩續鈔》，卷七收李衍孫，《得華山碑記事》，15b-16b。陳文述，《頤道堂集》文鈔，卷七，《揚州阮氏重刻西嶽華山廟碑書後》：「桂未谷《長垣本》跋謂吳江陸繩在西安見兩本，一售惠民李衍孫，一未翦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505冊，頁656。

[54] 盧又紳，《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

[55] 方維祺，《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冊。

[56] 邱學敏，《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冊。

[57] 王復，《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二冊。

[58] 故宮博物院藏，收入《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頁63。

[59] 趙希璜，《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卷十二（甲寅），《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13冊，頁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827）寄贈《國山碑》拓本，此前黃易曾多次向宜興友人儲潤書索取此碑未果。[60] 不過這個拓本乃未築亭時所椎拓，並非佳本，故黃易又向吳騫（1733－1813）索要更為精良的整拓。[61] 吳騫是浙江海寧州人，先世故有別業在荊溪，間歲來荊溪，尋訪考證，著《國山碑考》，此碑的成名與他有極大的關係。[62] 1796年，寓居河南河內縣的內閣中書康儀鈞（1767年舉人），為黃易拓取濟源與河內二縣各碑，並詢問《溫御史造碑》以及北宋石幢，黃易提供的《碑目》中並未列入，不知是否已得？[63]（圖9）

黃易晚年的健康狀況相當糟糕，在1800年寫給顧文鉌的信中，他自稱自上年冬天一病幾殆，而今春今夏又兩次病危，[64] 差不多同時，他也向趙魏報告自己貧病交深：

> 弟服官至今，貧病交深，欲拂袖而去，奈家無擔石何？戀此一官，真是萬不得已。幾乎右體不仁，服參藥二年，始得漸好，然作畫刻印竭蹶之至，只有翻弄碑帖、扇面自為娛悅而已。[65]（圖10）

此時，他的收藏重心也已轉向了書畫扇面，1797年，在寫給友人（有可能是董元鏡）的信中，黃易提及「年來集古人扇面二百餘，心獨不足，藉相好廣助之也」。[66] 到了1799年，扇面的數字已增加到三百，《致顧文鉌》云：「扇面已有三百餘面，四王之畫已有，甚思汪退谷、姜西溟、查初白等人一幅，不可得

---

[60] 唐仲冕，《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二冊。

[61] 黃易，《致吳騫》，上海圖書館藏，《龐虛齋藏清朝名賢手札》，第四冊，頁882-885。

[62] 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34冊。

[63] 康儀鈞，《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四冊。

[64]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65] 黃易，《致趙魏》，收入謙慎書道會編，《西泠八家の書畫篆刻》（東京：二玄社，1996）。1801年，趙希璜，《寄懷錢獻之同年》小注有「獻之自沛上來札云：黃小松司馬病足，與余同」云云。《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卷二十四（辛酉），《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13冊，頁173。同年，孫星衍，《致黃易》云：「聞足下體中近已復元，極宜保重，五十外人疏於房室，則到老耳聰目明，切要切要。」收入《二家書札》，國家圖書館藏。

[66] 四川省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耳。」⑰ 清初四王的扇畫他已各搜得一面，但汪士鋐（1658－1723）、姜宸英（1628－1699）、查慎行（1650－1727）等人的書法，卻杳不可得。約在同時寫給瞿中溶（1769－1842）的信中，黃易也提到「搜碑之外，廣集書畫扇面，裝裱成冊，已得三百餘種，尚孳孳不能息也」。⑱ 儘管如此，黃易仍未放棄任何徵集碑刻的機會，1801年左右，他將《小蓬萊閣金石目稿》寄給湖北德安知州胡壽芝，胡立即向他貢獻了新見碑刻，在「敢將土壤助山高，先生笑應雙手拍」的小注中，胡寫道：「時貽以《碧落碑》《太原令房璘妻壁記》及漢上新出三碣。」⑲

黃易的訪碑活動也得到地方官的大力支持，1796年秋冬之際的嵩洛之行，沿途得到登封知縣趙時、縣尉馬某、偃師知縣王復、魯山知縣董作棟、孟縣縣尉張葺亭、新安知縣鄒蔚祖、衛輝州判畢繼曾等地方官員的關照。⑳ 1797年春日的岱麓訪古，黃易在日記中提到的官員，除友人孫星衍、吳人驥、王轂、桂馥之外，還有山東巡撫伊江阿、泰安府知府金棨、泰安縣知縣蔣予林、同知張松岩、攝歷城知府徐某、權兗沂觀察金某、武定府同知王道亨、肥城知縣程尚義等。因為金棨與程尚義的允許，黃易有機會將郭巨塑像移出，拓後石壁，他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一難得的奇緣：

> （三十一日）晚飯金太守齋，肥城程大令與幕中馮、唐、黃三君談宴歡甚。余欲移肥城孝堂山石室內郭巨塑像於外露室後石壁，俾得全拓諸刻。金、程二君欣然許之，果成，亦金石奇緣也。㉑

---

⑰ 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⑱ 瞿中溶，《古泉山館詩集》，金昌稿卷一，《得小松書兼寄正始弩機款識及中平帳構文以詩報之》小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92冊，頁563。

⑲ 胡壽芝，《東目館詩集》，卷三，《〈小蓬萊閣金石目稿〉答小松司馬寄示》，《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52冊，頁28。黃易徵集拓片往往不止一份，《碧落碑》他至少已經從董元鏡、趙魏處得到兩個拓本。參見董元鏡，《致黃易》，見於西泠拍賣2018年春網拍；趙魏，《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

⑳ 參見《嵩洛訪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㉑ 參見《岱麓訪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上繁複的引徵，旨在說明，各處地方官在黃易的金石收藏活動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除了在黃易訪碑途中，為之提供食宿與繩索、架杆之類的工具，並派人員協助，他們還積極回應遠在山東的黃易提出的各種訪拓要求。無論是獲知信息還是組織椎拓，地方官都更具便利與執行力。到了晚清，碑刻拓片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商品，拓碑常常會遭到本地鄉民的阻擾，這時候還需要地方官出面擺平爭端。⑫

由於黃易結識的州府官員散佈於全國各地，故而即使僻在邊陲的碑刻，他也有機會獲得拓本。在這裡，「地方」並不意味著封閉，相反它暗示了一種流動，地方官到處調動，這就意味著一位官員很可能為黃易拓致的並非只有一地的碑版。

地方官的重要性，翁方綱也深有同感。如他曾寫信向桂馥探聽：「青州段生諾為手拓《琅琊臺》全字，聞太守已諾為辦之，未知何時可得也。」⑬ 這裡提到的段生即益都人段松苓，他同意為翁方綱拓《琅琊臺》石刻，但需得到青州知府達霖的許可。在寫給黃易的信中，翁也曾提到：「但學政欲拓碑，總視所遇地方官何如耳。」⑭ 即使貴為一省之學政，想要拓碑仍需得到地方官的配合。

地方官中確實有不甚配合的，如翁方綱聽說山西介休縣蔡邕隸書《郭有道碑》原石具存，雖然碑字已被人磨去，他仍請知縣祝德全（1781年進士）為他拓來，希望能辨識一半文字。翁的要求讓祝十分納悶：「現存廟中有漢隸者翁

⑫ 如吳式芬《致瑛棨札》云：「弟欲遣張顯往安陽、林縣拓碑，已信致子衡。如張顯來省，尚祈函致樊、康兩大令，令俾鄉民勿阻為荷。」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特藏部編，《清代名人手札彙編》（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第1冊，頁111。樊、康分別指樊琨（道光三十年任安陽知縣）、康仲方（道光二十六年任林縣知縣），瑛棨時為河南布政使。

⑬ 翁方綱，《致桂馥》，上海圖書館藏，沈津輯入《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頁553。《復初齋文集》，卷二十，《跋琅邪臺秦篆》亦云：「《琅邪臺秦篆》，世皆稱存十行耳。予以壬子夏按試青州，訪諸學官弟子，此篆刻在諸城縣海濱懸厓，極難拓。有段生松苓善氈蠟，諾為予拓之。」《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頁545。

⑭ 翁方綱，《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公不要，而郭墓之石竟無一字，要拓之何用？」翁方綱為此向黃易抱怨說：

> 此在翰林出身之賢令尹，其言尚且如此，則何怪古刻之日湮乎？現已急寫札往，云郭墓之石雖無字，亦必拓之，但不知其肯拓否耳。[75]（圖11）

在翁方綱的一再催促下，祝德全終於為他拓來郭墓之石，從拓片上看，此碑正背俱有穿，是漢碑無疑，但是磨去之後，竟然無一畫半畫可辨，翁氏為此自我解嘲說：「虛費吾輩一段懷想之意也！」[76]（圖12）又如黃易請河南知府施誠為拓《嵩山三闕》，施嗤笑要此敗紙何用，故黃易告知趙魏，再求無益。[77] 而桂馥在給黃易的信中，談到《天柱山銘》求之半年，未得其便，蓋地方官俗物，不足與談。[78] 而一些無知的地方官，也是黃易友人圈的笑料，如嚴長明（1731－1787）將作嵩洛之遊，拓取登封石闕，因致札該縣知縣，孰料知縣回覆說：「查志，有《啟母廟》，未闕。」顯然他將石闕之「闕」誤為殘缺之「缺」，讓嚴覺得無話可說。[79]

三、黃易的服務

回報幾乎伴隨著黃易所收穫的每一件金石拓本。儘管我們無法盡指黃易為一件具體的拓本付出過什麼，但他的收穫必定是長期社交經營的結果。

大部分時間裡，黃易都在山東濟寧做官。濟寧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它處於魯西南黃淮平原與魯中丘陵交接處，是一個較為狹長的運河地帶，這裡「南控江淮，北接京畿」，是京杭大運河的中樞區段，北往的船隻在轄區內先後經魚臺進入泇河，經濟寧、濟寧衛至鉅野、袁家口（南旺南湖），再經東阿至張秋，嗣經聊城、臨清、德州進入直隸段。由於水源缺乏，且地勢南高北低，既

---

[75] 翁方綱，《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
[76] 翁方綱，《致黃易》，上海楓江書屋藏。
[77] 黃易，《致趙魏》，上海圖書館藏，《龐虛齋藏清朝名賢手札》，第四冊，頁882-885。
[78] 桂馥，《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一冊。
[79] 嚴長明，《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六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需以泉水補充水源，也需要用閘來控制和調節水量，故這一段也是運河全線水閘最為集中之處。[80]

途徑此地的官員和友人，黃易常常要為他們提供各種方便與服務，諸如接待、護送、過閘放行、雇傭車船，甚至轉寄信件。[81] 有時他還要招待朋友的親友，並為他們處理覓職、陞遷以及給付盤纏之類的瑣碎事宜。胥繩武曾長期游幕山左，在濟寧與黃易分別之後，曾致札感謝：「一年來飲食教誨至詣隆情，有逾骨肉，鐫銘心版，歷劫難忘。一旦遠違光霽，能不依依？」[82] 在另一封信中，他由衷感歎黃易的人脈：「吾兄知交之廣、友誼之真，敬服敬服！」[83]

在為黃易銘墓時，黃易的親家潘庭筠寫道：

> 濟寧為水陸交沖，驛使星軺，如少司寇王述庵、宮詹錢幸楣、制軍畢秋帆、觀察孫淵如及翁覃溪學士、阮芸臺相國視學山左，皆旌節頻臨，檢閱儲藏，講論互勘。[84]

他提到的王昶、錢大昕、畢沅、孫星衍、翁方綱、阮元，多是朝廷高官，又是學界赫赫有名的人物。事實上，因為濟寧的地理位置，黃易與經過這裡的各個層級的官員、學者都很熟稔，這成為黃易徵集各地碑版的重要契機。

黃易也收藏字畫，主要通過杭州、蘇州、揚州等江南城市友人的協助，如黃易曾請求羅聘為覓張四教《琵琶美人》、金農《蘭亭》以及錢載的畫作，[85]

---

[80] 全省共53閘，濟寧段有21閘，設有閘官，掌瀦泄啟閉事。

[81] 如翁樹培曾託黃易代致瞿中溶要信一件，《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一冊。王聘珍稱家中三四月間有人隨糧船到沛，「倘有家信投入貴署，務祈加封郵致督學行轅。」《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一冊。

[82] 胥繩武，《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一冊。

[83] 胥繩武，《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四冊。

[84] 魏成憲，《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錢唐黃君墓誌銘》（魏謙升鈔本），裝裱於黃易《山水卷》拖尾，浙江省博物館藏，《中國古代書畫圖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003），第十一冊，頁603。

[85] 黃易，《致羅聘》，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61；黃易，《致羅聘》，私人藏。黃易《致錢樾》也曾求取錢載畫作，上海博物館藏黃易《功德頂訪碑圖》拖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顏崇榘任興化縣知縣時，黃易也曾作札：「興化鄭板橋、李復堂之跡易得否？弟欲覓板橋大橫幅竹子及復堂豬藤卷，不知有所遇否？」[86] 但拓本的性質與字畫有所不同，它不是現成品（除了少數舊拓），常常需要即時尋訪與製作。各時期的金石文物遍布全國，即使是三通館這樣的官方機構，也很難實現系統的搜集與椎拓。黃易試圖以一己之力，編織一個四通八達的網絡。在他的往來書札中，常常見到拓碑的委託與回應。除了購買罕見的舊拓，一般情形下，黃易甚至不需要付錢。

過境時的款待與幫忙，是黃易與人結交的重要方式。各地官員及其親友經停濟寧，黃易也會提供貼心的服務。如錢坫家兄路過時獲黃易多方照應。[87] 洪亮吉（1746－1809）家人自水路北來，道經濟寧，黃易一切照拂。儲潤書秋試結束後南歸，窘於旅費，亦由黃易料理一切。[88] 途徑濟寧水閘密集之地，最麻煩的就是過閘，有沒有官方頒發的「溜子」——一種放行檔，直接關係到旅程是否順利，在時間上會不會被耽擱。在友人的信札中，此類求請不絕如縷：

> 周震榮：敝親家鄂樓大兄，舊交也，挑赴滇南，才殊可惜，今先挈眷口回里，道經濟寧，所有溜差等事，大兄必為之一一熟籌之，毋俟僕之贅言矣。[89]
>
> 翁方綱：王實齋（聘珍）過閘，幸推誼付一溜子，感感。[90]（圖13）
>
> 戴經：茲有菉塘家兄，係現任太常寺少卿，名璐，近以奉諱南還，道由貴境，聞河水短少，舟行非易，家兄到州必當奉拜，敢懇老先生給付溜子，俾得過閘無阻，趲行迅速，則感勒之私不啻身受，想必定邀俯允也。[91]
>
> 邵晉涵：（同縣）華君因家中有事，從張灣買棹南還，聞沿途有截留舟楫之信，甚以為慮。過境如有阻滯，祈賜放行，則佩德靡既矣。[92]

---

[86] 黃易，《致顏崇榘》，收入《內藤湖南藏清人書畫：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所藏品集》（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平成二十一年）。

[87] 錢坫，《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冊。

[88] 洪亮吉，《致黃易》，上海博物館藏黃易《功德頂訪碑圖》卷拖尾。

[89] 周震榮，《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一冊。

[90] 翁方綱，《致黃易》，上海楓江書屋藏。

[91] 戴經，《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二冊。

[92] 邵晉涵，《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二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了黃易頒給的逐站放行與接待的文件，旅途不僅更為緊湊，也更加安全舒適。而提前雇車馬或是船隻，也是重要的服務，如杭州何元錫友人進京秋試，因日期甚促，恐途中或為水阻，必須起旱，故託黃易預為雇覓車馬。[93] 管河通判袁秉鈞友人將南歸，打算經濟寧坐船回杭州，但不知此時是否有尖頭船可雇？請黃易先行打聽，倘若一時無船，望立即示知，以便預定長行車輛。[94]

此外諸如在濟寧謀職，向上司關說，黃易也時常受人之託。余集的一位友人以京師居無可圖，且離家鄉較遠，打算到山東謀筆硯之席，請黃易代為吹薦。[95] 儲潤書的友人精於堪輿術，訪友來東，道出任城，希望黃易推愛噓植。[96]（圖14）張塤的友人急欲得一氈之地，以謀養母之資，託黃易關說河帥，令其得就河工。[97] 顏崇榘則要求黃易在學使阮元面前鼓吹他好事樂古，這樣或有被賞識的機會。[98] 何琪在得到張映璣升為浙江都轉的消息之後，請黃易在張氏經過濟寧時，為其長子極力噓致，俾得就職。[99]

黃易還要設法根據友人的要求，關照一些間接友人，他們大多是剛在山東任職的低級官吏：

> 汪端光：蔣香雪在京，弟為作合相見，已蒙披瀝相待。今東裝東來，一切俱望指南，俾無差謬，如弟身受然。[100]
>
> 嚴守田：舍弟甫田朴拙篤材，獲因依德宇，得奉訓辭，更荷惠愛之深，曲加陶鑄，近聞委署滕汛，皆出自栽培，銘感之私，結不去抱。[101]
>
> 周震榮：汪君名彝銘，副榜，館滿分發河南，以州同試用。……與秋塍亦

---

[93] 何元錫，《致黃易》，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217。

[94] 袁秉祠，《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一冊。

[95] 余集，《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二冊。

[96] 儲潤書，《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97] 張塤，《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七冊。

[98] 黃易，《致顏崇榘》，見吳長瑛輯，《清代名人手札甲集》，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3）。又見上海崇源2002年首拍。

[99] 何琪，《致黃易》，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209。

[100] 《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八冊。

[101]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四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總角文字世交，或可因屋烏之故拂拭提攜，轉之清波，如秋塍之例，其功德不可思議。[102]
>
> 陳焯：茲有德清兩徐君，……投效東河，已蒙奏准。惟是初登仕版，仍是書生，於一切工程似難即時諳習。因念九兄大人著績河工，為帥府所倚重，仰望者何止天際真人。為介一言，惟希推愛，不吝指南，俾獲得陶者之型，感同身受矣。[103]

這裡面既有要求指點、教誨的，也有要求栽培、提攜的。諸如此類的世俗人情，黃易都需要處理得當。由於他在歷任總督府與運河廳中都有不錯的人緣，朋友們的這類要求大多可以得到滿足。當黃易推誠施愛，給人種種方便與面子之後，幫助打聽與拓取碑刻，也就成為對方義不能辭之事。

四、書畫印的酬贈

黃易的篆刻、書法與繪畫在當時有很高的知名度。對書畫印的求索幾乎充斥於任何一封寄往黃易的書札中，而對求索的回應，則是黃易回報友人與地方官員的又一重要方式。

清初以來，兩浙印人多學莆田林皋（1657－？）一路悫熟印風，丁敬（1695－1765）的出現使得風氣大變。魏錫曾（？－1882）論印詩有「朱文啟鈍丁，行刀細如掐」句，小注云：「修能（朱簡）為趙凡夫（趙宧光）制印甚多，其篆法起訖處時作牽絲，頗與凡夫草篆相類。何夙明嘗述尊甫夢華先生語云：鈍丁（丁敬）印學從修能出，今以朱文刀法驗之，良然。」[104] 意思是說，明人朱簡（1570－？）刻印從趙宧光（1559－1625）草篆得到啟發，點畫起訖都表現牽絲引帶的趣味，而根據何元錫之子的說法，朱簡這一獨特的篆刻技法也啟發了丁敬。丁敬的印章，行刀頓挫起伏，頗得古拗峭折之趣。他當時聲名

---

[102]《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六冊。

[103]《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214-215。

[104] 魏錫曾，《積語堂論印匯錄・論印詩二十四首》所收《朱簡修能》，收入鄧實、黃賓虹主編，《美術叢書》（上海：神州國光社，1920），後集第2集，頁1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極大，至有「求之者白鏹十金為鐫一字」的說法。[105]

黃易少年時曾向這位父執問業，阮元以為有過藍之譽，推為海內第一。他在總結黃易篆刻的特點時，特別指出其入印文字薈萃金石刻文的精華，來豐富印文的結字，而不斤斤於《說文》或是漢印文字，故不求生動而自然生動。[106] 1785年，宋葆淳注意到《小黃門譙敏碑》篆額小字甚精，其中「黃」字頗為有致，他覺得「小松得此，正可取以作印」，[107] 宋氏認為黃易刻印會取此特殊字樣，以增奇趣，這說明友人們熟知黃易篆刻的用字特點。[108] 黃易的另外一個特點，是構思精密，但下刀非常俐落，這也是從丁敬那裡繼承而來。翁方綱曾目睹黃易作印，過程極為瀟灑，「談笑之頃，鐵穎剸然，立成數枚，出懷袖以贈友」。[109]

1763年三月，二十歲的黃易為畫家陸飛（1765年解元）刻「賣畫買山」一印，他的老師何琪以為「傑出諸刻」。[110] 這一時期黃易正游幕楚北，將軍經泰也曾向黃庭稱讚黃易：

> 吾師二兄鐵筆真大家派，惜乎朗亭已死，介庵不得示其一見使之倒退三舍，乃知世有一入手便蒼古秀勁。況二兄方英年，再進二十年，當又另具一雙眼目賞之耳。[111]

---

[105] 李斗，《揚州畫舫錄》，卷四，《續修四庫全書》，第733冊，頁617-618。

[106] 阮元，《小滄浪筆談》，卷二，《叢書集成新編》，第79冊，頁557。在丁敬、黃易之後，入印文字以《說文》與繆篆為準繩的要求，遭到越來越多的批評，如郭麐，《靈芬館詩三集》，卷三，《題張老姜鏐印譜》:「舉世皆說文，一丁群言啦。刻印必繆篆，朱老膠故常。」《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5冊，頁175。

[107] 宋葆淳跋，黃易所藏，《小黃門譙敏碑》，今藏故宮博物院。

[108] 魏錫曾，《積語堂論印匯錄・論印詩二十四首》所收《黃易秋盦》亦云：「朱文六國幣，白文兩漢碑。」頁3a。嗣後趙之謙在「松江樹鏞考藏印記」一印邊款中自謂取法秦詔漢燈之間，為六百年來樵印家立一門戶，實沿襲此一邏輯。

[109] 翁方綱，《復初齋文集》，卷十三，《黃秋盦傳》，頁471。與翁方綱的印象不同，阮元稱黃易生平不輕為人作，雖至交亦不過得其一二石。《小滄浪筆談》，卷二，頁557。

[110] 何琪，《致陸飛》，《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

[111] 經泰，《致黃庭》，《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一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知黃易早年奏刀已自不凡。他善用切刀，白文印點畫飽滿而富於節奏，既顯得流動，也有遲澀趣味，如「葆醇」；朱文印早年學元朱文，後多作漢印體式，並強化碎切刀法，頗有奇致，如「竹崦盦」。（圖15）其刀趣過甚者如白文「季逑父」、朱文「松屏」則略顯臃腫或是破碎。（圖16）中年以後，黃易篆刻聲名漸隆，西泠四家中的另一位篆刻家奚岡（1746－1803），認為自己的畫或過於黃易，但黃的篆刻讓他心悅誠服，在自刻「鶴後山人」的邊款中，他坦率地寫道：

> 友人黃易詩翰固妙，而畫不如吾，石刻一道吾實不如易。是刻成，適易從淮南寄四印至，視之真不啻大小巫之謂。⑫

而錢塘藝林的後勁陳鴻壽（1768－1822）雖未曾與黃易謀面，也十分欣賞他的篆刻：「秋翁平生篆刻第一，畫次之，隸書又次之。」⑬

黃易書法也有早秀的表現，他十三歲時即篆書「雲松巢志」刊石。⑭游幕楚北時，石卓槐對少年黃易的善書印象深刻，《黃小松舍人》有句云：

> 竹林涼月坐吹簫，常作縱橫十六條。小注：小松工鐵筆，作玉筋篆文，信手揮豪，莫不如意，常以方紙縱橫作十九畫，成一棋局，不差分毫，蓋絕技也。⑮

石卓槐以黃易徒手畫棋盤而分佈均勻的例子，說明黃易對筆墨超強的控制能力。黃易的隸書，用筆崇尚平實，字法皆準繩漢碑。在武進學者呂星垣（1753－1821）看來，他的隸書外枯中膏，簡嚴而勢放，入《禮器碑》堂奧，「近來北方學者以隸書推翁覃溪先生，覃溪鐵幹槎枒，而座下較多餘地，此事又推獨步矣。」⑯不過黃易自我剖析說，古人論書法，最難打破一「拘」字，

⑫收入《西泠四家印譜》（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79），頁85。
⑬陳鴻壽跋黃易書札，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114-115。
⑭魏成憲，《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錢唐黃君墓誌銘》，頁603。
⑮石卓槐，《留劍山莊初稿》，卷二十四，《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92冊，頁654。
⑯《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他正坐此病，做不到天馬行空，筆趣自然。[117] 他的兩位友人伊秉綬（1754－1815）與陳鴻壽，則將一種沉厚的古拙趣味與顯著的裝飾感巧妙結合在一起。1784年，錢坫在致書黃易時，嘗引友人李衍孫之語云：「平生所見三絕，謂足下（黃易）分隸，周二十五印章，及僕小篆，僕自愧不倫也。」[118]（圖17）周二十五很可能是祥符人周世紹，與黃易熟識，[119] 他的印章曾被汪啟淑（1728－1799）編入《飛鴻堂印譜》，此時他與錢坫都遊宦陝西。錢坫引用這番話，雖然表現得很自謙，但無疑認可這樣的說法。四十歲的黃易，已躋身友人口中的「藝壇三絕」之一，可見他的隸書自有過人之處。

黃易的山水畫，早年曾得陸飛指授。翁方綱以為「雖兼效倪、黃而實自成一格，蒼秀出意表」，[120] 他的取法可能沒有翁說的那麼高古，明末以來的董其昌、程嘉燧（1565－1643）、李流芳（1575－1629）、邵彌（約1592－1642）、楊文驄（1596－1646）、王鑒（1598－1677）、石溪（1612－1692）、漸江（1610－1664）、 士標（1615－1698）、胡玉昆、王翬（1632－1717）、惲壽平（1633－1690），以至近人高其佩（1672－1734）、汪士慎（1686－1759）、金農、（圖18）江立、陸飛等人的畫法，[121] 他都曾摹習，這應該與他的書畫收藏有關。雖然奚岡賣畫為業，極為勤奮，「東方未白即起，研北括括，役其五指」，[122] 他自詡作畫成就超過黃易，但吳雲（1811－1883）卻不這麼認為，他對黃易山水格外青睞，稱其「筆意雋逸，設色淡雅，同時以畫擅名者如鐵生、蘭士、椒畦學力雖勝，而一種名貴氣皆所不逮，所謂得味外味也」。[123] 與吳雲同時的金石學家李佐賢（1807－1876），也認為黃易餘事兼及繪畫，別具古雅

[117] 黃易，《致潘奕雋》，上海圖書館藏。

[118] 錢坫，《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119] 顧湘，《小石山房印苑》（清光緒三十年顧氏藏板），卷十一收周世紹「靜逸庵」朱文印，所附小傳云：「與黃小松、翁覃溪諸先生交，皆雅重之。」頁5。

[120] 翁方綱，《黃秋盦傳》，頁471。

[121] 黃易繪畫的取法，可參見《黃小松山水冊》，中國嘉德2017年秋拍；《黃易書畫冊》，無錫博物院藏。

[122] 奚岡，《致黃易》，收入《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218-219。

[123] 吳雲跋，《黃秋盦山水冊》，龐元濟，《虛齋名畫錄》，卷十六著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091冊，頁168-1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之趣，「非同時奚鐵生、王椒畦諸公所能及也」。[124] 他們所提到的奚岡、方薰（1736－1799）、王學浩（1754－1832）都是功力深至的畫家，但中國畫最終動人的乃是氣質。雖然吳、方只是一家之言，但黃易的墨筆山水多淡遠含蓄，草草落筆，而掩映虛實，讓觀者常有畫外之想。

雖然在書畫印三個領域，黃易都有不俗的成就，但他不以此為業，雖然少年時代曾為陸飛刻過「賣畫買山」一印，但他從未像職業藝術家——如他的友人羅聘、奚岡、方薰或是鄧石如（1743－1805）那樣售賣自己的作品，即使是最貧窮的時刻。外界對於黃易書畫印的渴慕，只能通過各種人情關係輾轉請索，這種請索的回饋，有時就是金石拓片或是前人書畫。而回報那些幫助拓碑的友人，黃易常常也饋贈自己的作品。

黃易的書畫印，頗為各級官員所青睞。幾任河道總督，如姚立德、[125] 陳祖輝、[126] 李奉翰、伊江阿[127] 等，黃易都曾領命治印。1780年，李奉翰一次性要求黃易為治十二枚印章，同時還索要小隸書：

> 逕致者，來章十二方，希照擬句於公餘時鐵筆一鐫，又題舊墨詩一幅，即照來紙尺寸寫小隸書，以便發刻是荷。
> 江月隨人影、皆大歡喜、清適道成、李奉翰章、戒之在得、連得（小篆）、薜林、予亦何人、寧靜、山花趁馬蹄、實慰我心、聽雪居士。[128]
> （圖19）

一次性要求黃易為刻十二方印，對於上司而言，並非偶一為之，李奉翰很可能也將黃易的篆刻作為禮品送給他人，在另一封信中，他發給印石二十四方：

---

[124] 見李佐賢，《石泉書屋類稿》，卷七，《題黃小松仿古山水冊》，《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24冊，頁397。

[125] 黃易為姚立德所刻有「姚立德字次功號小坡之圖書」、「立德」、「小坡」、「河南山東河道總督之章」、「大司馬總憲河東河道總督章」諸印。

[126] 黃易曾刻「陳輝祖印」。

[127] 黃易，《岱岩訪古日記》：「中丞伊公命酌，談嶗山風景，……中丞擅草聖，命刻二巨印。」

[128] 李奉翰，《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書石十五件，並稍大者九件，希撿收應用。何篆？如何配合？衡鑒定雅。小件者擬單一紙，仍祈斟酌鐫之是荷。」[129] 1793年，漕運總督梁肯堂（1717－1801）也曾求畫求印：「所苦印章絕無佳者，特寄上一紙，非徒拜求鐵筆，並祈以文石見惠。」在給黃易的信中，他畫出了「晚香居士」、「梁肯堂印」、「春淙亭主」等三枚印章的形狀。[130]（圖20）

為黃易張羅拓碑的地方官員及其幕僚，也多有類似的請求。如周震榮索得對聯一副，印章四枚（其中一方「生於癸丑」），又為其弟周升桓（1733－1801）索刻「梅花里」，為何飛熊索名印，[131] 並幾次三番請求黃易為他的亡妻隸書志文。[132] 1789年，周升桓在收到黃易寄來的印章之後，又向黃易求濟寧漢碑十三通，並打算「徐徐再懇法隸名畫，無饜之求正未有艾，特恐足下無能一一應之耳」。[133] 正是這樣的無厭之求，使得黃易很可能找到代刀人，周升桓在委託周震榮求印時，有一字條云：「聞伊有二小廝皆傳其技，可亂真，較之他手終勝。只要小松自篆，亦無不可，與之說明。」[134]

1770年代，潘應椿除了索求對聯數件，[135] 也多次要求黃易刻印：「至先生摹印之文，仰慕已久，明日當擬數字，面求大教。」[136] 1777年，黃易曾為刻數枚，其中一方「病指生」時常鈐蓋在潘的信札中。[137] 1778年，東昌府同知龔孫枝專門派人上門求黃易鐵筆，但黃遲了兩年才完成，「無字山房」邊款云：「梧生司馬愛易刻印，走書來索，易云：有事濟州，馬跡車塵，不得少息。

---

[129] 李奉翰，《致某》，見於西泠拍賣2018年3月藝是網拍。從所委刻印事，可知受書人為黃易無疑。

[130] 梁肯堂，《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二冊。黃易曾為梁刻「春淙亭主」、「梁肯堂印」，並摹「永壽」玉印，以為梁肯堂六十之壽。

[131] 周震榮，《致黃易》二札，《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

[132] 周震榮，《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九冊。

[133] 周升桓，《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134] 此札附於周震榮《致黃易》之後，《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九冊。

[135] 潘應椿，《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冊。

[136] 潘應椿，《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

[137] 潘應椿，《贈歐湖王秀才理堂七古》：「病指近復煩小松（君曾為余作「病指生」印）。」《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五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匆匆二年矣！」[138] 此外，黃易還為龔氏向周震榮、奚岡等人轉求書畫。[139] 另一位東昌同知吳人驥，黃易曾為刻「吳人驥」、「念湖」、「人驥」諸印。[140]（圖21）1786年，荊州知府張方理（？－1802）為青州副都統慶霖求對聯一副、印章二方，[141] 慶霖在隨後的信中稱：「遍尋未得上好青田，想足下代家兄覓來必多，擇其次等，分鐫一二方見惠，肯否？」[142] 不久黃易與慶霖相見，為作書畫多種，慶霖在謝函中說：「承足下非常雅愛，始而應酬故事，幾若惜墨如金，旋因移贈鄙人，更為揮毫滿紙。」[143] 沔縣知縣李衍孫則要求黃易為他的養母之所「春暉山館」書寫對聯。[144] 1789年左右，編修王增求得黃易兩方印章，在改任懷慶府通判後再次來信：「又需兩圖章，非鉅手不可，曰『拙』、曰『慵』，每方一字，圓亦可。」並在所鈐「方川」一印下作小注：「如此大足矣。」[145] 1791年，蘇松常督糧通判鄭辰向黃易求書書廳的柱聯。[146] 1793年，泰安知縣江清為自己求隸書對聯一副，為兒子江鳳彝求隸書橫幅一紙。[147] 1795年，宜興知縣唐仲冕不僅求黃易刻印、作隸，還通過他轉索桂馥書法。[148] 此外，青州知府胡德琳求刻「秋風涼月一聲簫」印；[149] 任城書院山長盛百二為臨清衛守備王湘求隸書二幅；[150] 正定知府邱學敏求分書齋聯一對；[151] 河道總督蘭

---

[138] 龔孫枝，《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139] 周震榮，《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六冊；奚岡，《致黃易》，見《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頁188-193。

[140] 印稿見黃易，《嵩洛訪碑日記暨丙辰隨錄手稿》（丙辰當為乙卯、丙辰之誤），西泠拍賣2014年春拍。

[141] 張方理，《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一冊。

[142] 慶霖，《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九冊。

[143] 慶霖，《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八冊。

[144] 李衍孫，《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一冊。

[145] 王增，《致黃易》二札，《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第七冊。

[146] 鄭辰，《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一冊

[147] 江清，《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148] 唐仲冕，《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二冊。

[149] 《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三冊。

[150] 《黃小松友朋書札》，第五冊。

[151] 《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錫之子蘭德滋求黃易對聯與印章等。[152]

1796年九、十月間的嵩落訪碑之行，黃易為登封知縣趙時及其幕友胡赤霞作書；在洛陽，與新安知縣鄒蔚祖來訂交，鄒為黃易嵩少之遊資助十二兩銀子，求黃易過偃師時，在知縣王復署中為他作書。[153]（圖22）在王復齋中，黃易與武億叔侄、嵩知縣朱某等人聚飲，劇談風雅，「座中人索書小聯，盡應之。」[154] 因王復陪同黃易遊龍門訪碑，黃易為作《龍門覽古圖》長卷。[155] 次日至孟縣，為同知張葊亭書「四硯山房」小額。十月初四日，至衛輝府，為同知畢繼曾書「石供山房」匾。[156] 這些書畫的酬應，都是對地方官員給予拓碑旅程中種種關照的回報。

雖說一些友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請索，確可稱得上「無厭之請」，但他們聲稱類似的請索「意在摩挲手跡，如見古心」，[157] 他們在黃易的書畫印中，獲得了對「古」的真切感知，一如1794年幕游山左的吳友松所言：

> 未谷言，海內刻印章者寥寥數人，先生其一家也……友松愛先生之畫與印章，猶乎先生之愛金石文字，先生能以一畫一印以副友松之望乎？[158]（圖23）

黃易很可能回應了吳友松的求畫，在一件《梅花》立軸的款識中，他寫道：「向有惲正叔梅花便面，為歸觀察所奪，今作此並錄惲詩，應秋鶴先生

---

[152]《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一冊。

[153] 鄒蔚祖，《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尺牘》，第三冊。

[154] 見《嵩洛訪碑日記》。

[155] 此卷王昶、王芑孫等有題詠，《春融堂集》，卷二十二，《題敦初龍門攬古長卷二十韻，時與黃小松、武虛谷同遊》，《續修四庫全書》，第1437冊，頁588；《淵雅堂全集》編年詩稿，卷十四，《家秋塍大令復以嘉慶元年九月與黃小松易、武虛谷億為嵩少伊闕之遊，尋碑選勝，作圖紀事，其年十二月往求孫淵如星衍篆題其首，明年五月以書抵余華亭官所求詩》，《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冊，頁526。

[156] 見《嵩洛訪碑日記》。「四硯山房」隸書匾額，故宮博物院藏。

[157] 龔孫枝，《致黃易》，收入《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158] 吳友松，《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一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囑，黃易。」[159]（圖24）當黃易以獲得古代的金石拓片為「古歡」的時候，一些友人也將獲得他的書畫印章，同樣視為一種「古歡」。在他們看來，雖然時代有別，但其中所蘊含的精神氣質——古心——卻高度一致，他們收藏黃易的書畫印，與黃易收藏金石拓片在性質上並無不同。

由於黃易精通書法、繪畫與篆刻——這在乾嘉金石圈中絕無僅有，因而在應酬外界需求時，他比翁方綱、孫星衍等人僅能書法具有更大的優勢。無論是主動的饋贈，還是被動的回報，這些禮物因為滿足了四方之士的渴求，成為他們為黃易尋訪與製作金石拓本的重要動力。

餘論

黃易的徵集網路遍及全國各地，他的藏品背後，也隱藏著一段段獨特的交情。趙魏曾不無羨慕地說：「金石之緣，至兄而四通八達矣，弟安得不妒？然亦不必妒，兄之餘即我之所有也。」[160] 在羨慕之餘，趙魏希望能夠搭上便車，分享他多餘的副本。

雖說金石學在明末清初已有振興之勢，但訪求碑刻與搜集拓片的風氣，還只局限於極少數的學者與書法家。到了乾嘉時期，金石收藏的規模擴大了許多，但全國性的流通市場還遠未形成，「帖估」、「帖賈」或是「帖友」還只偶然出現在收藏者的生活中。不像晚清時期，拓片的徵集雖然也依賴朋友圈，但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市場性，王懿榮（1845－1900）、葉昌熾（1849－1917）等人需要不時與碑帖販子打交道。

黃易既以運河中轉之便，為各色官員與友人提供便利與服務，同時利用自己在藝術上的擅長，為他們作書作畫，或是篆刻印章。而黃易所具有的這些特殊的回報方式，使得他有更多資源來動員各色人等來為他的金石收藏服務。

總體上看，與黃易有書信往來的200餘人，大多曾為他的收藏活動提供過幫助，從高官、地方官、幕僚、山長到布衣、掮客、罪犯，不一而足。通過拓

[159] 蘇州篤齋藏。

[160] 趙魏，《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片，他們之間形成了一個事實上的金石學共同體。這個共同體雖然沒有明確的組織構造，但它的成員具有相似的知識背景，在情感方式與趣味體驗上也有相當的統一性，比如他們多少都瞭解金石的文獻價值與書法價值，至少認同拓本可以作為風雅的禮物。這個共同體的活力，在於其中的任何人都有可能接觸到金石拓本，並願意與其他人分享拓本以及對拓本的感受。在這個共同體中，學者可以貢獻意義賦予與美學鑒賞，地方官員可以動用權力組織搜訪與椎拓，幕僚與訪碑者可以貢獻足跡所至的金石拓片，在地的文人可以貢獻本地碑板，古物收藏者可以貢獻舊拓本，掮客可以貢獻較為隱秘的資訊，商人可以貢獻拓本的轉移與流動。

（責任編輯：陳卉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傳統文獻

孔繼涵
《致黃易》，私人藏。
王芑孫
《淵雅堂全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王宗敬
《我暇編》，《續修四庫全書》，第117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王昶
《春融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37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石卓槐
《留劍山莊初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朱筠
《笥河詩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3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笥河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江鳳彝
《致顏崇榘》，故宮博物院藏。
何道生
《雙藤書屋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吳式芬
《致瑛棨》，收入北京大學圖書館古籍善本特藏部編，《清代名人手札彙編》，第1冊，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
吳騫
《國山碑考》，收入《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34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李斗
《揚州畫舫錄》，《續修四庫全書》，第73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李佐賢
《石泉書屋類稿》，《清代詩文集彙編》，第6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李佐賢輯
《武定詩續鈔》，清同治六年利津李氏刻石泉書屋全集本。
李奉翰
《致某人（黃易）》，西泠拍賣藝是網拍，2018年3月。
阮元
《小滄浪筆談》，《叢書集成新編》，第7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周升桓
《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林侗
《來齋金石文考略》，《石刻史料新編》，第2輯，第8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
武億
《授堂金石文字續跋》，《續修四庫全書》，第8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段松苓
《山左碑目》，國家圖書館藏。
洪亮吉
《致黃易》，黃易《功德頂訪碑圖》卷拖尾。
胡壽芝
《東目館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5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奚岡
《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收入《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孫承澤
《庚子銷夏記》，《中國書畫全書》，第7冊，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3-1998。
孫星衍
《致黃易》，收入《二家書札》，國家圖書館藏。
《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
《寰宇訪碑錄》，《石刻史料新編》，第1輯，第26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7。
翁方綱
《復初齋文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45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致桂馥》，上海圖書館藏，收入沈津輯，《翁方綱題跋手札集錄》，南寧：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致黃易》，上海楓江書屋藏。
《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
張塤
《竹葉庵文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7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曹溶
《靜惕堂詩集》，清雍正三年刻本。
清人輯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四冊)，故宮博物院藏。
郭麐
《靈芬館詩三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8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文述

《頤道堂集》,《續修四庫全書》,第150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陳法駕修、曾鑒纂

《(民國)華陽縣誌》,民國二十三年刻本。

陳焯

《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收入《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黃易

《致顏崇榘》,收入吳長瑛輯,《清代名人手札甲集》,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15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1973。

《小蓬萊閣金石文字》,《石刻史料新編》,第3輯,第1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

《秋盦詩草》,《秋盦題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46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致顏崇榘》,收入《內藤湖南藏清人書畫:關西大學圖書館內藤文庫所藏品集》,日本:關西大學出版部,平成二十一年。

《致趙魏》,收入謙慎書道會編,《西泠八家の書畫篆刻》,東京:二玄社,1996。

《致王復》,故宮博物院藏,收入秦明等編,《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致吳騫》、《致趙魏》,上海圖書館藏,收入梁穎整理,《龐虛齋藏清朝名賢手札》,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

《小蓬萊閣金石目》,南京圖書館藏鈔本。

《山水冊》,中國嘉德2017年秋拍。

《四硯山房隸書匾》,故宮博物院藏。

《岱麓訪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致友人》,四川省博物院藏。

《致李鼎元》、《致顧文鉌》,北京藝術博物館藏。

《致趙魏》、《致潘應椿》,上海圖書館藏

《致潘奕雋》,上海圖書館藏。

《致錢樾》,上海博物館藏,黃易《功德頂訪碑圖》卷拖尾。

《致羅聘》,私人藏。

《書畫冊》,無錫博物院藏。

《得碑十二圖》,天津博物院藏。

《梅花軸》,蘇州篤齋藏。

《嵩洛訪碑日記》,國家圖書館藏抄本。

《嵩洛訪碑日記暨丙辰隨錄手稿》,西泠拍賣2014年春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易輯
《黃小松友朋書札》(十三冊),國家圖書館藏。
黃易舊藏
《魏受禪碑》拓本,故宮博物院藏,收入秦明編,《蓬萊宿約:故宮藏黃易漢魏碑刻特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10。
《小黃門譙敏碑》拓本,故宮博物院藏。
《裴岑紀功碑》拓本,國家圖書館藏。
歐陽詢《九歌》、《千字文》拓本,國家圖書館藏。
黃易題刻
《鄭季宣碑》原石,濟寧博物館藏。
趙希璜
《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1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潘應椿
《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蔣啟勳修、汪士鐸纂
《(同治)續纂江寧府志》,清光緒六年刊本。
瞿中溶
《古泉山館詩集》,《清代詩文集彙編》,第49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顏光敏
《樂圃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18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
魏成憲
《山東兗州府運河同知錢唐黃君墓誌銘》,魏謙升鈔本,見黃易《山水卷》拖尾,浙江省博物館藏。
魏錫曾
《積語堂論印匯錄》,收入鄧實、黃賓虹主編,《美術叢書》,後集第2集,上海:神州國光社,1920。
龐元濟
《虛齋名畫錄》,《續修四庫全書》,第109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顧炎武
《致顏光敏》,收入顏光敏輯,《顏氏家藏尺牘》,《叢書集成新編》,第89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
顧湘
《小石山房印苑》,清光緒三十年顧氏藏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近人論著

桑椹

2012 〈東漢《祀三公山碑》早期拓本流傳及其後世影響〉，收入秦明主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頁284-296。

Sang, Shen

2012 "Donghan '*Si Sangongshan bei*' zaoqi taben liuchuan ji qi houshi yingxiang (Circulation of the Early Rubbings of the "Stele of Worshipping Mount Sangong" in the Early Han Dynasty and Their Influences in Later Generations)," in Ming Qin, ed.,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Huang Yi and Epigraphy*, Beijing: The Palace Museum Press, pp. 284-296.

秦明

2012 〈黃易的漢魏碑刻鑒藏〉，收入秦明主編，《黃易與金石學論集》，北京：故宮出版社，頁16-36。

2017 〈黃易「小蓬萊閣」印沿用考〉，《西泠藝叢》，第9期，頁9-19。

Qin, Ming

2012 "Huang Yi's Appreciation and Collection of the Han and Wei Stone Rubbings," in Ming Qin, ed., *Proceedings of the Symposium on Huang Yi and Epigraphy*, Beijing: The Palace Museum Press, pp. 16-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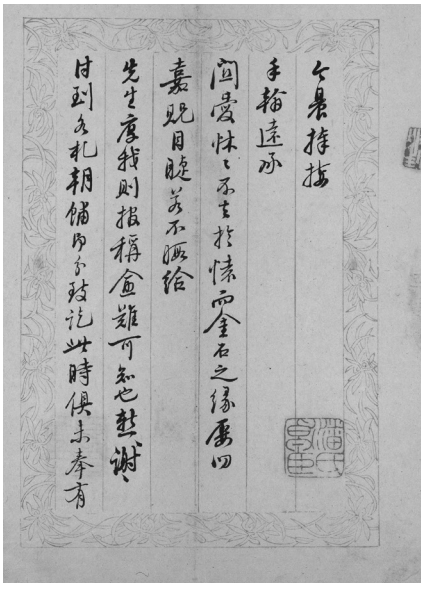
2017 "Huang Yi 'Xiao Penglaige' yin yanyong kao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Use of Huang Yi's Seal of "Small Penglai Pavilion")," *Xiling Academic Magazine of Traditional Arts*, no. 9, pp. 9-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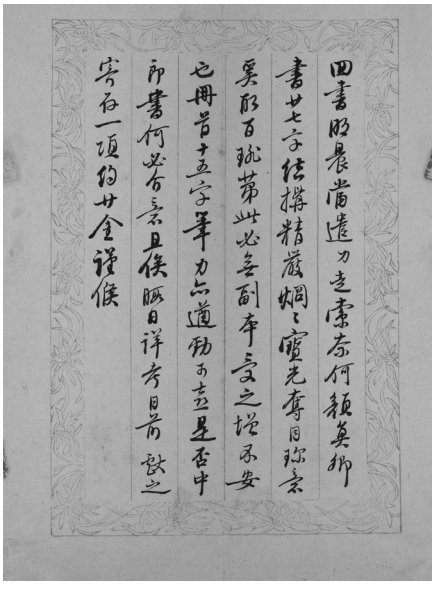
圖版出處

圖1　潘有為，《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藏。
圖2　黃易，《得碑十二圖》，錢大昕、魏成憲題詩，天津博物院藏。
圖3　黃易白文印「小松所得金石」及邊款，收入小林斗盦編，《篆刻全集》，第四冊，《中國（清）丁敬 蔣仁 黃易 奚岡》（東京：二玄社，2001）。
圖4　黃易，《致王復》，收入秦明等編，《故宮藏黃易尺牘研究・手跡》（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圖5　黃易，《致趙魏》，上海圖書館藏。
圖6　孔繼涵，《致黃易》，私人藏。
圖7　江鳳彝，《致顏崇榘》，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潘應椿，《致黃易》，上海圖書館藏。
圖9　康儀鈞，《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四冊，故宮博物院藏。
圖10　黃易，《致趙魏》，收入謙慎書道會編，《西泠八家の書畫篆刻》（東京：二玄社，1996）。
圖11　翁方綱，《致黃易》，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翁方綱，《致黃易》，上海楓江書屋藏。
圖13　翁方綱，《致黃易》，上海楓江書屋藏。
圖14　儲潤書，《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圖15　黃易白文印「葆醇」、朱文印「竹崦盦」，收入《篆刻全集》，第四冊，《中國（清）丁敬 蔣仁 黃易 奚岡》。
圖16　黃易白文印「季逑父」、朱文印「松屏」，收入《篆刻全集》，第四冊，《中國（清）丁敬 蔣仁 黃易 奚岡》。
圖17　錢坫，《致黃易》，《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圖18　黃易，《仿金農畫竹》，收入《黃易書畫冊》，無錫博物院藏。
圖19　李奉翰，《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圖20　梁肯堂，《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二冊。
圖21　黃易印稿「人驥」、「吳人驥」、「念湖」等，見《嵩洛訪碑日記暨丙辰隨錄手稿》（丙辰當為乙卯、丙辰之誤），西泠拍賣2014年春拍。
圖22　鄒蔚祖，《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尺牘》，第三冊。
圖23　吳友松，《致黃易》，《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一冊。
圖24　黃易贈吳友松《梅花軸》，蘇州篤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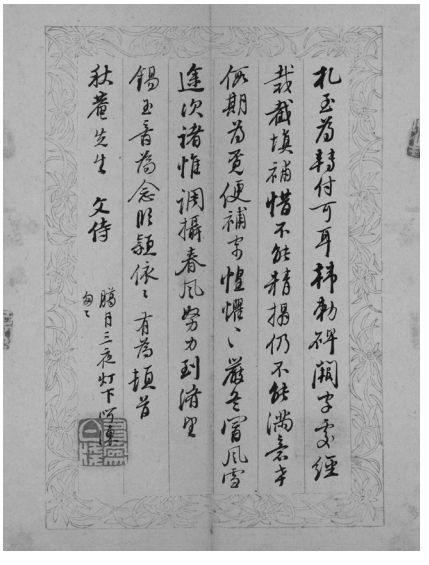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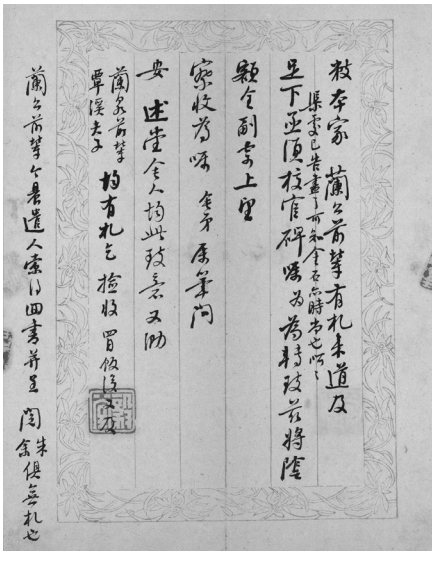
1-1



1-2



1-3



1-4

圖1　潘有為　《致黃易》　《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十三冊　國家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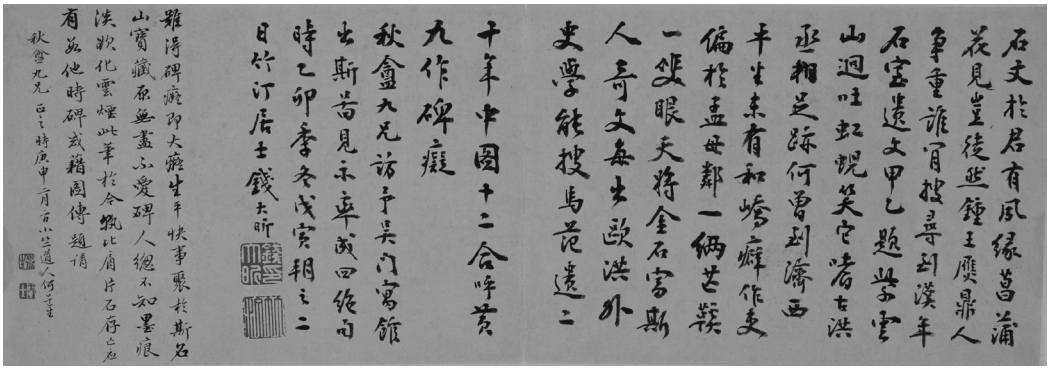


圖2 黃易 《得碑十二圖》 錢大昕、魏成憲題詩 天津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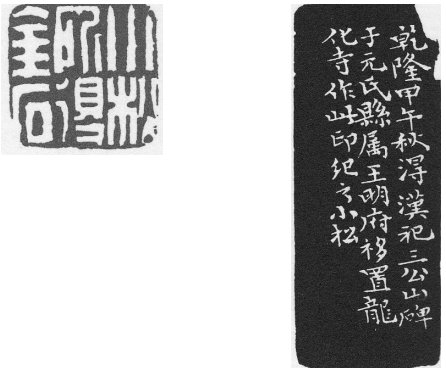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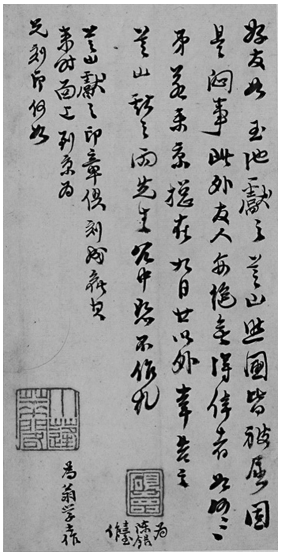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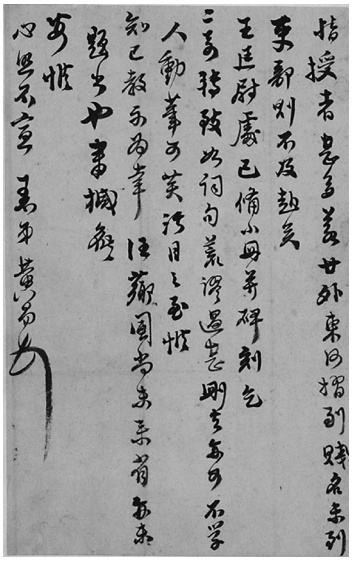


圖3 黃易白文印「小松所得金石」及邊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4-2



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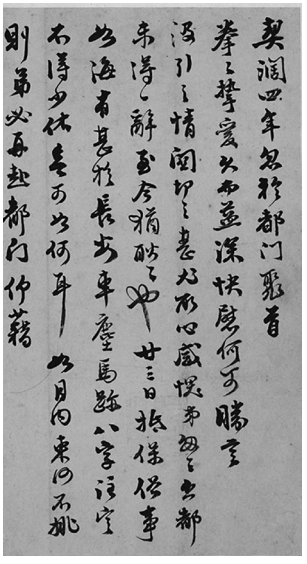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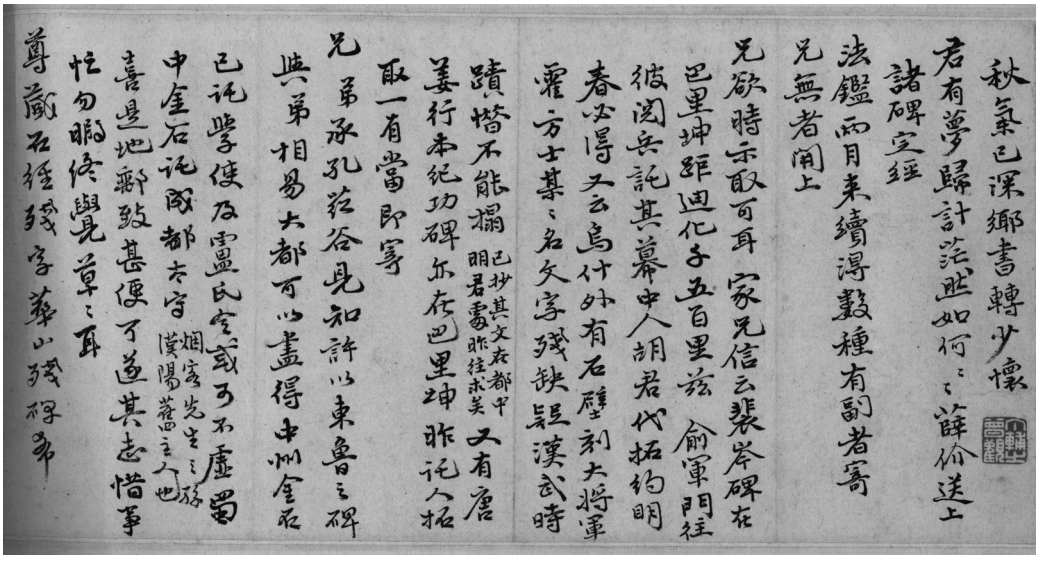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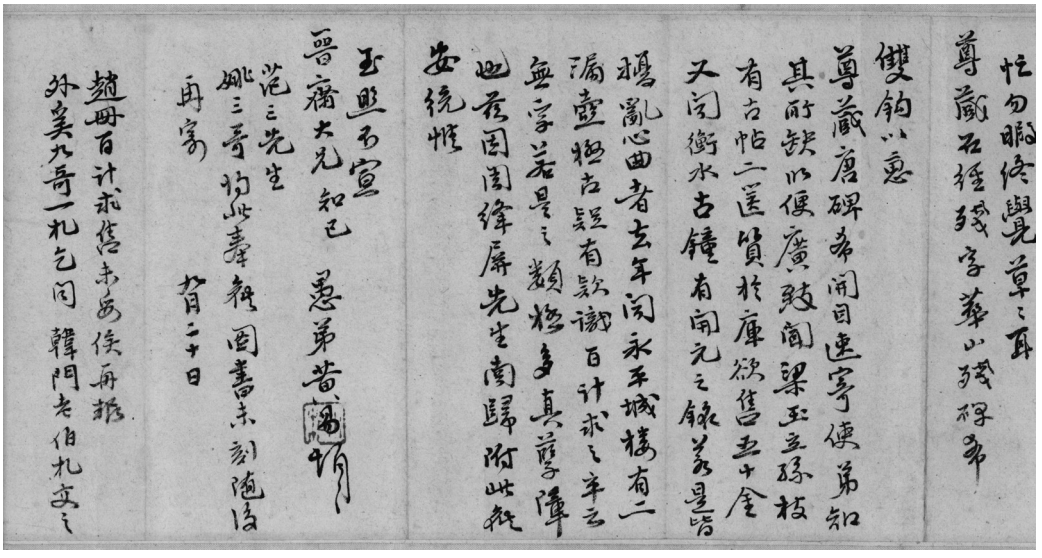


圖4 黃易　《致王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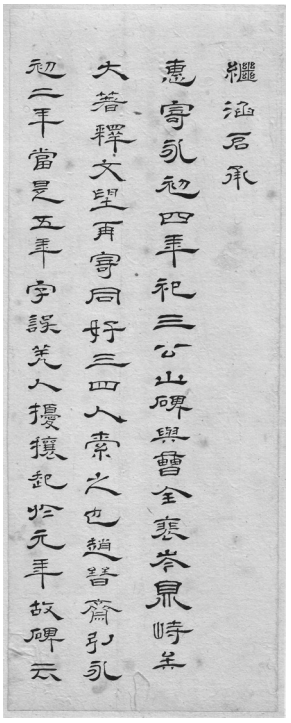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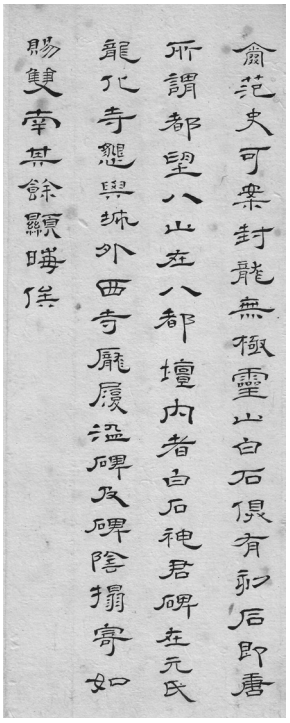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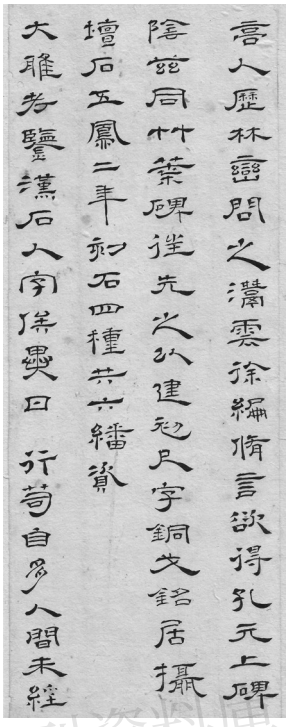
5-2

圖5 黃易 《致趙魏》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1


6-2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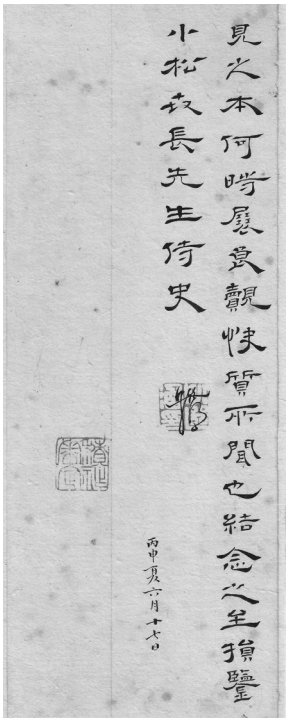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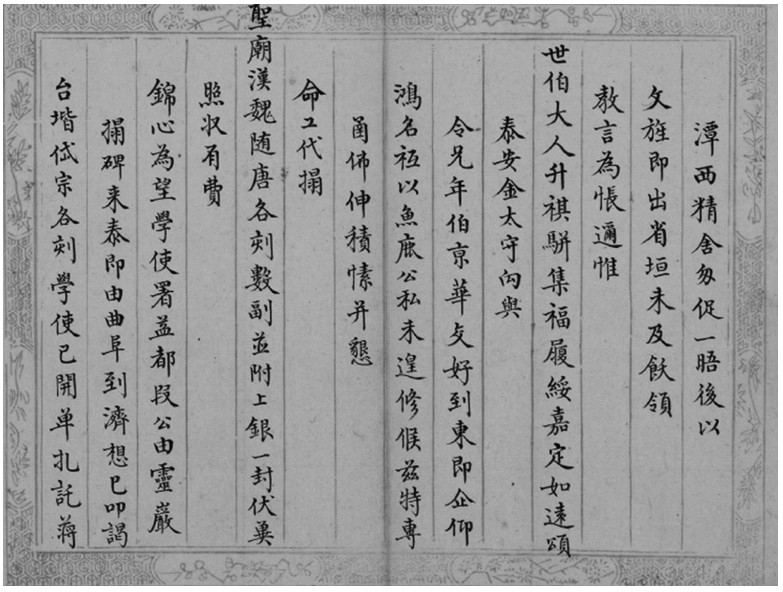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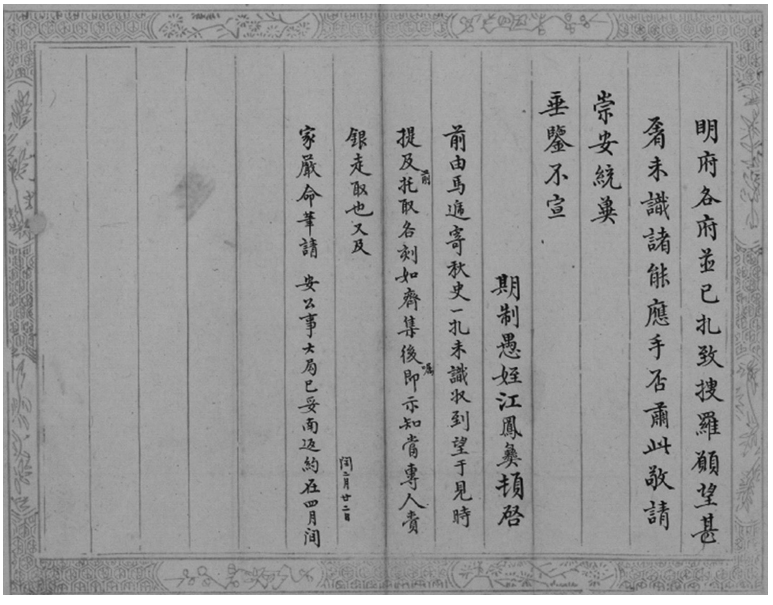

6-4

圖6 孔繼涵　《致黃易》　私人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7-1



7-2

圖7 江鳳彝 《致顏崇榘》 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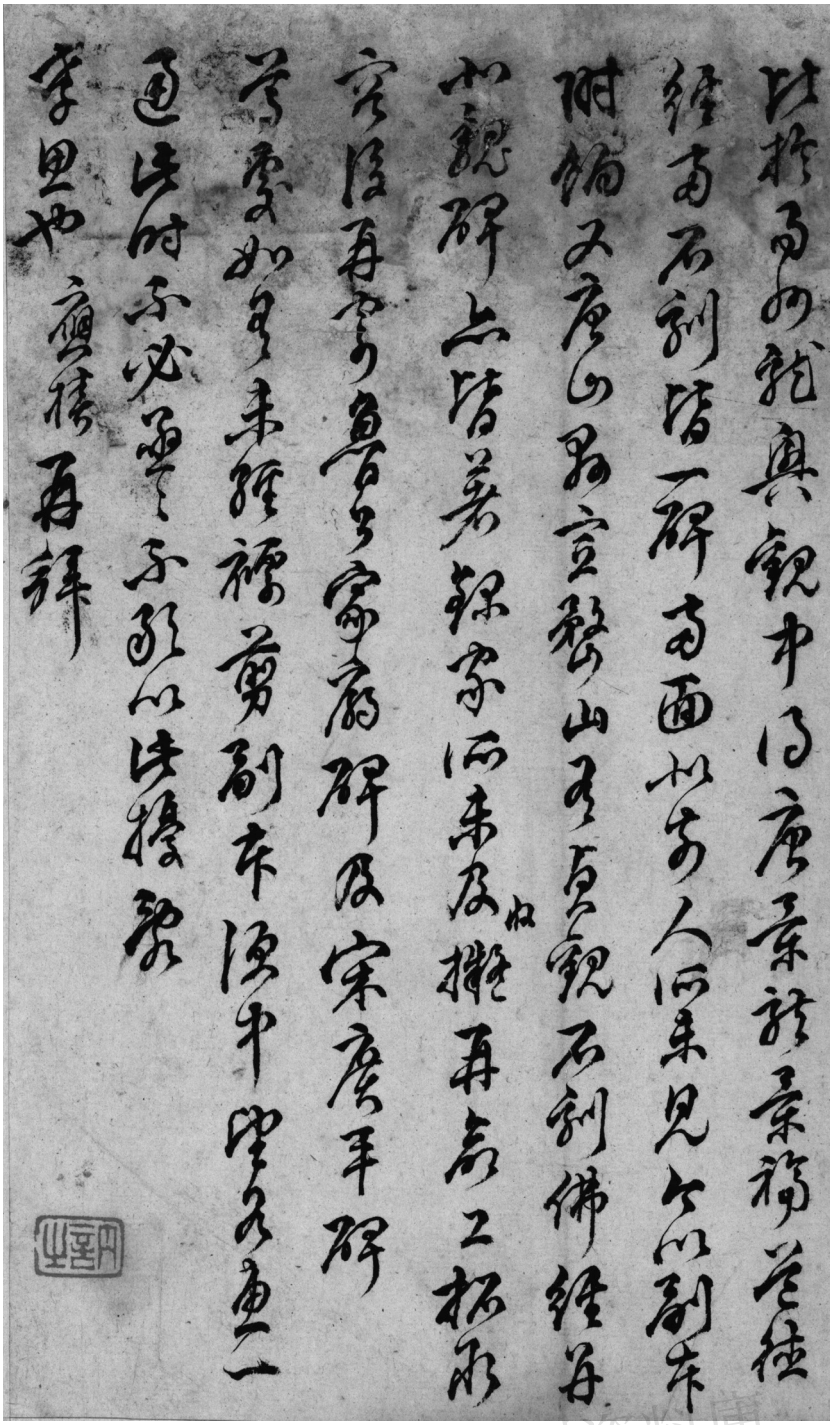


圖8 潘應椿　《致黃易》　上海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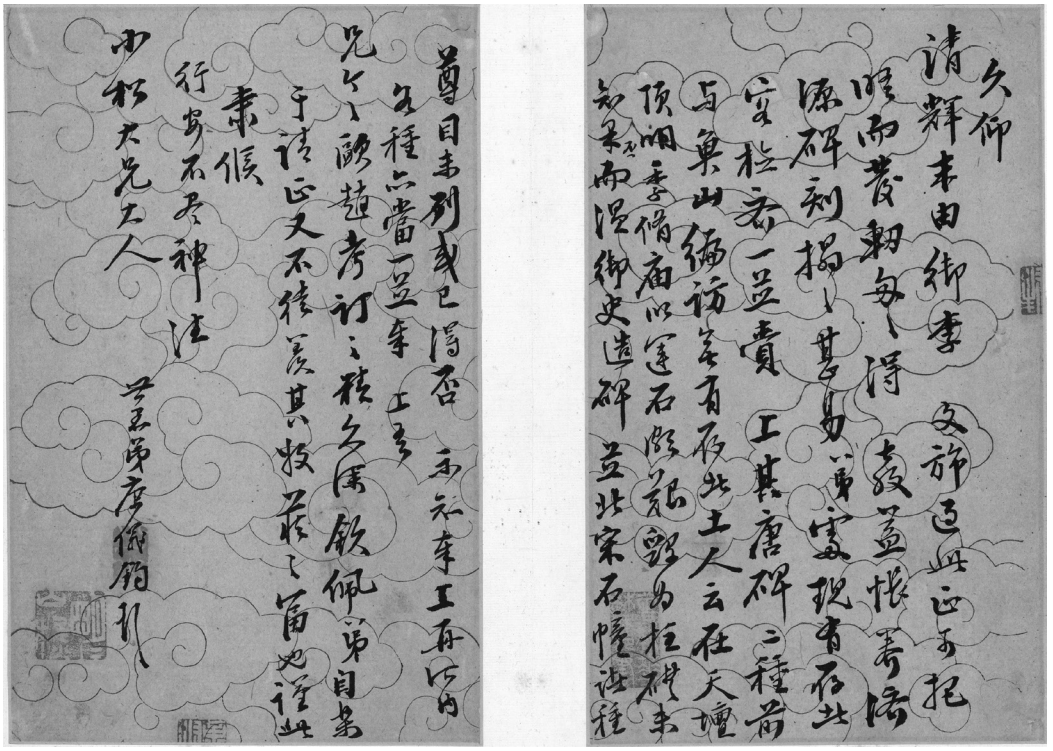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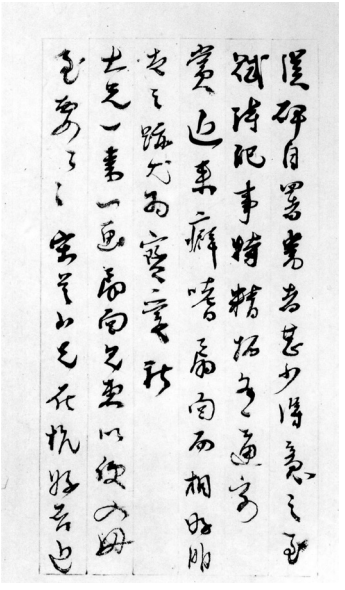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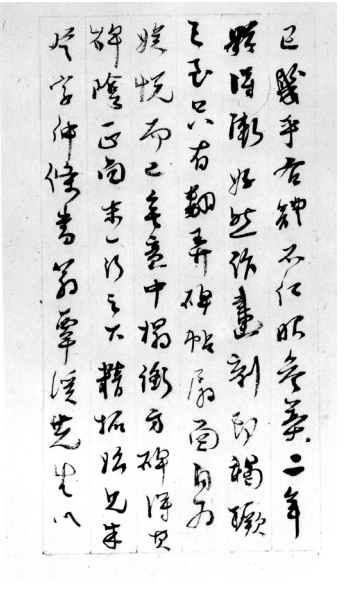


圖9 康儀鈞 《致黃易》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四冊 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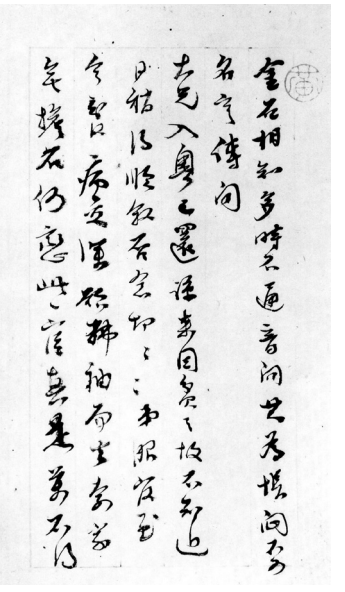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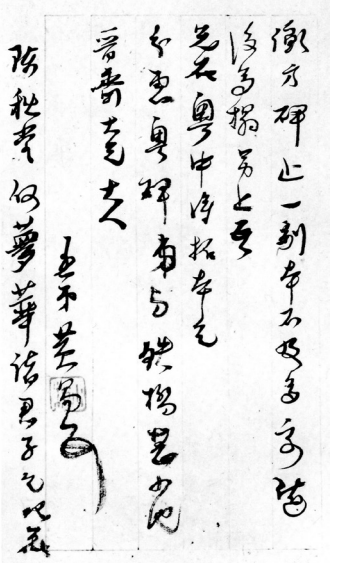
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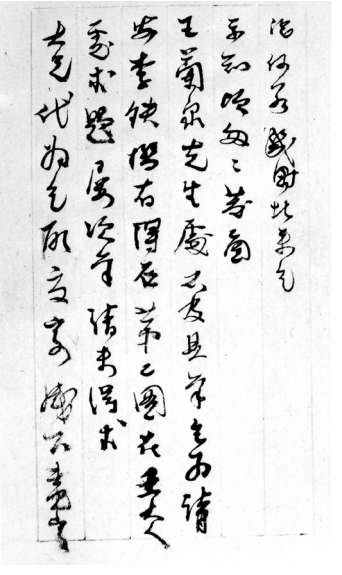
10-2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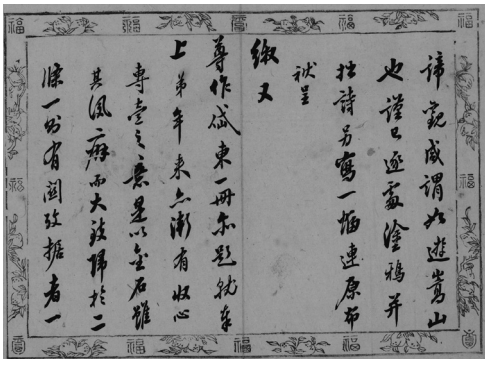
1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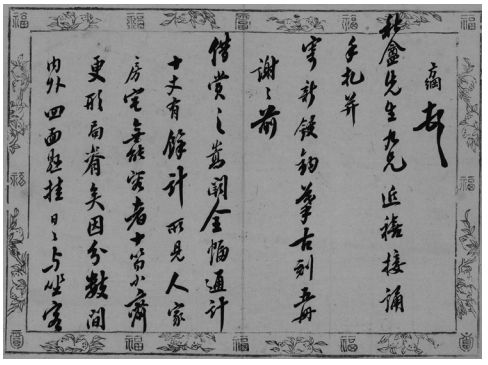
10-4

圖10 黃易　《致趙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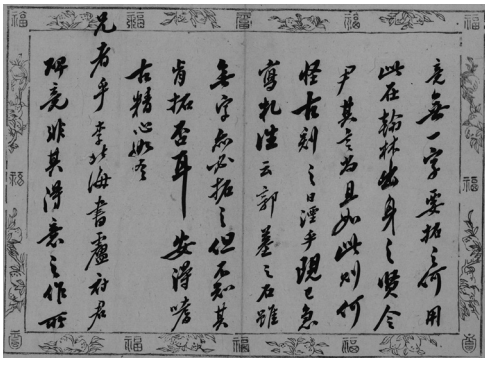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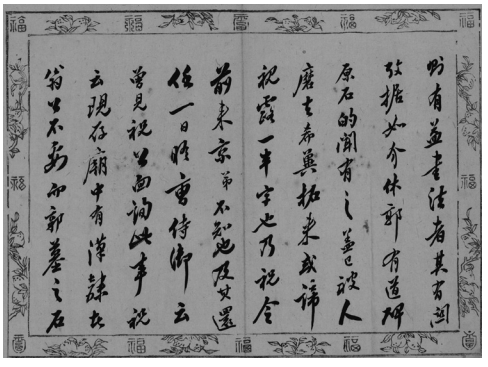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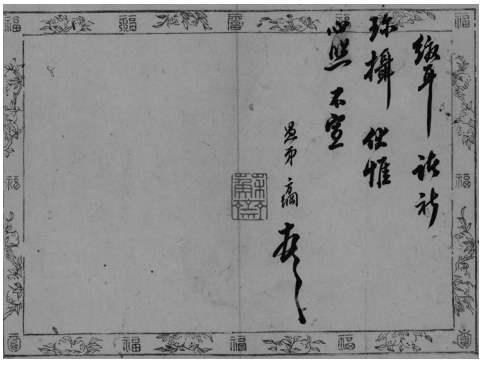
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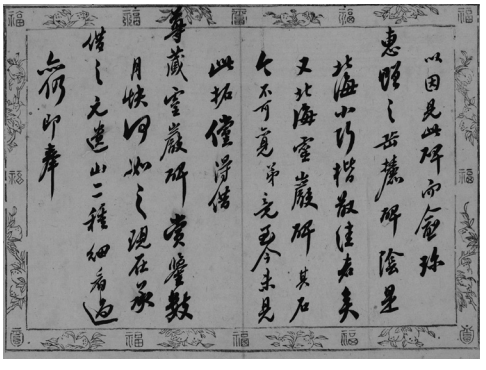
11-4



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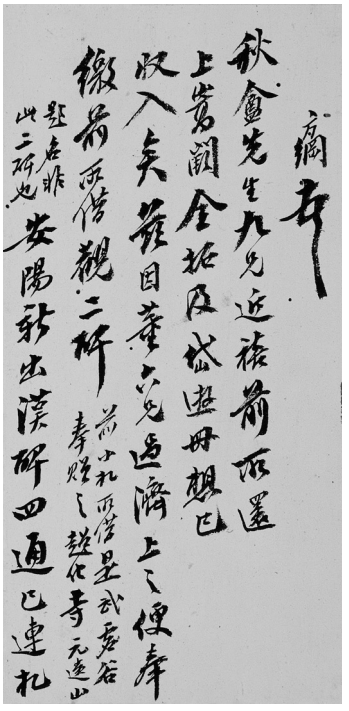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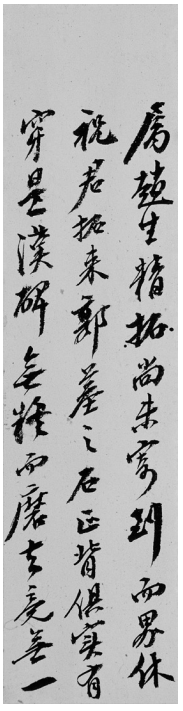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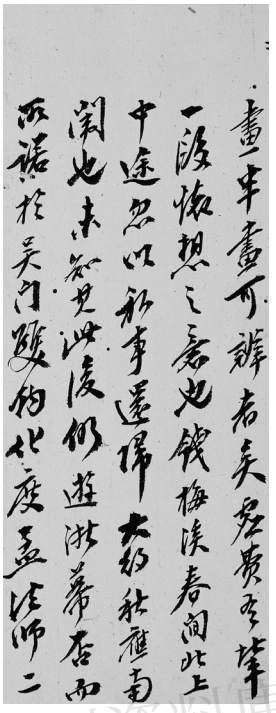
11-5

圖11 翁方綱 《致黃易》 故宮博物院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2-1


12-2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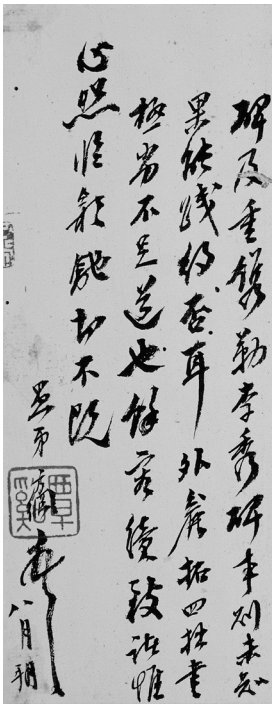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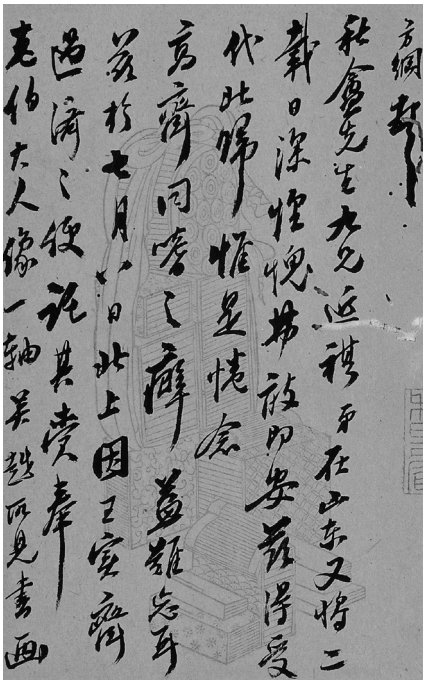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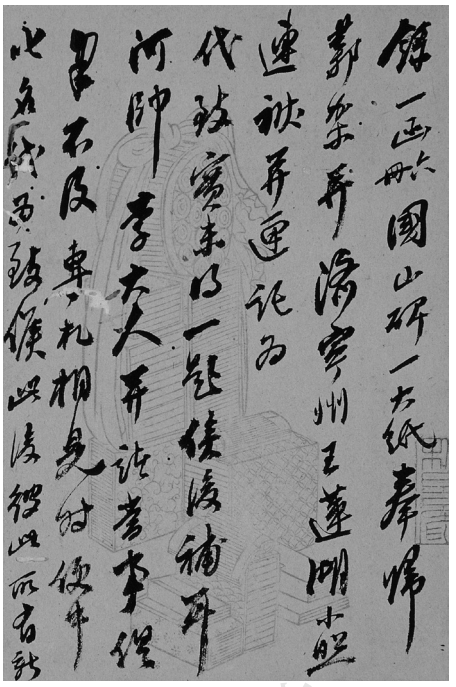

12-4

圖12 翁方綱　《致黃易》　上海楓江書屋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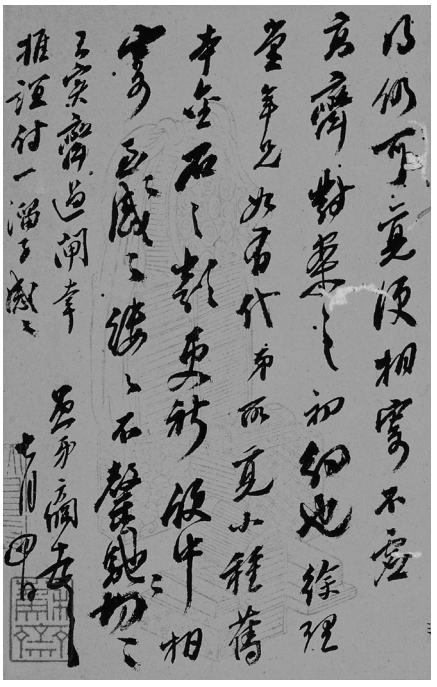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3-1



13-2



13-3

圖13 翁方綱 《致黃易》 上海楓江書屋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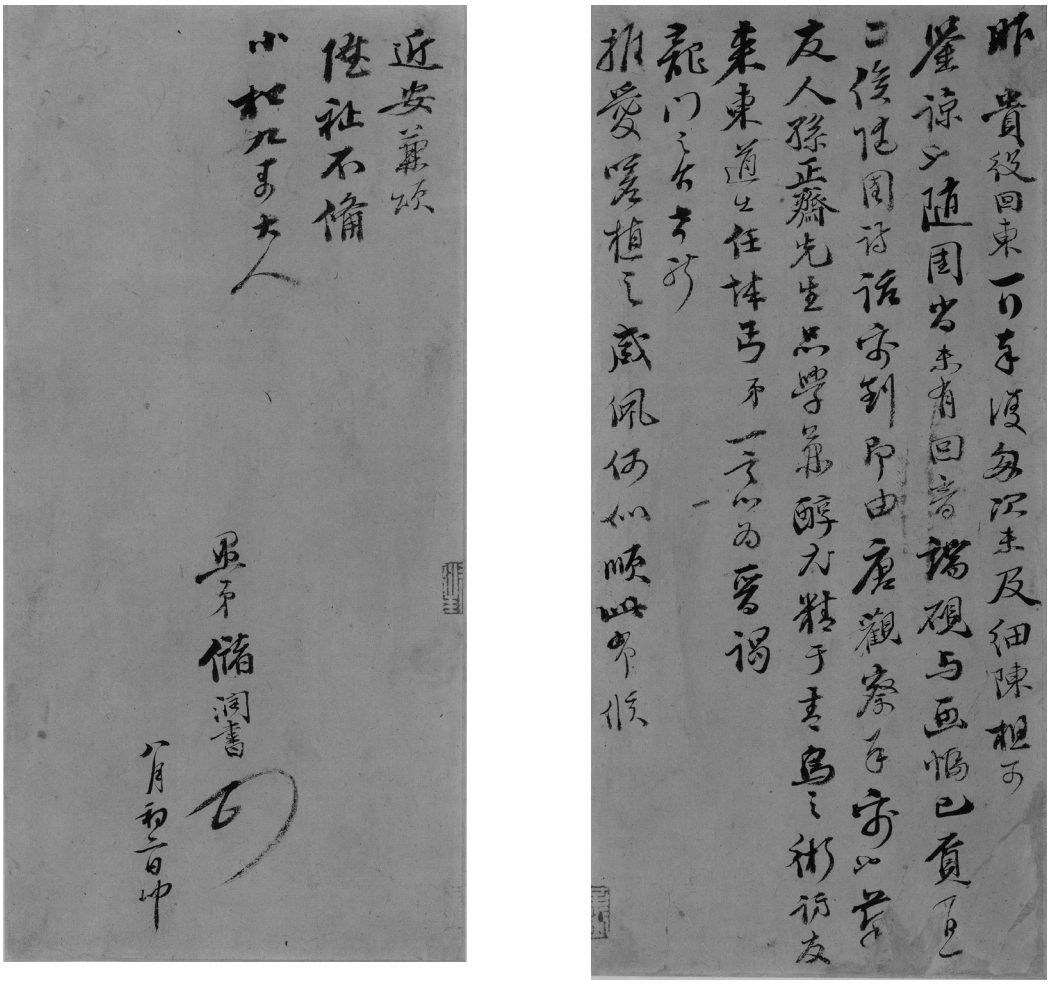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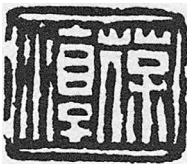


圖14 儲潤書　《致黃易》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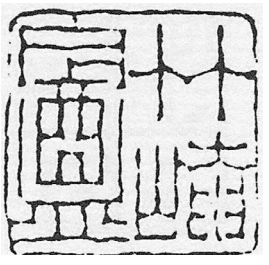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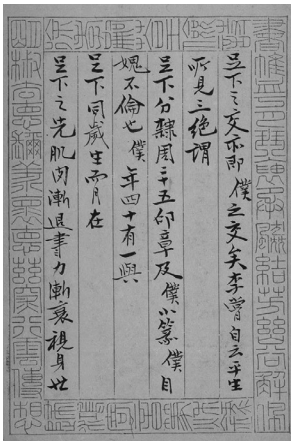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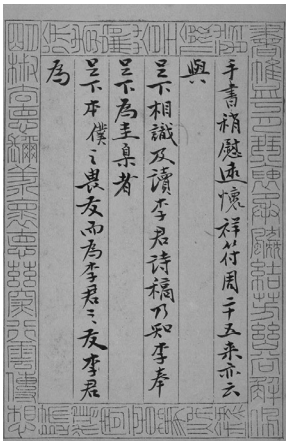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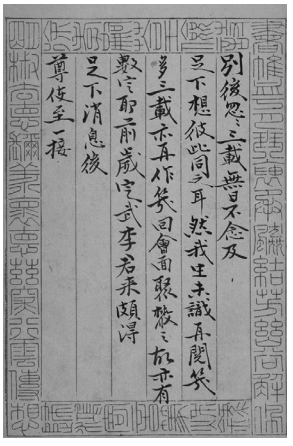
圖15 黃易白文印「葆醇」、朱文印「竹崦盦」
圖16 黃易白文印「季逑父」、朱文印「松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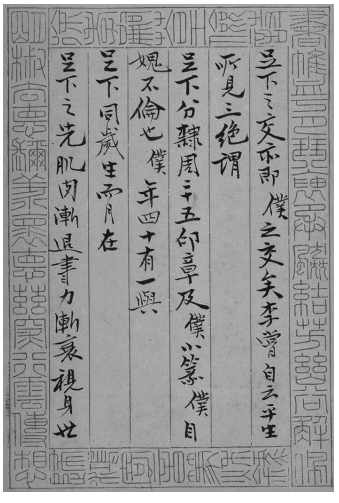


17-2





17-1



1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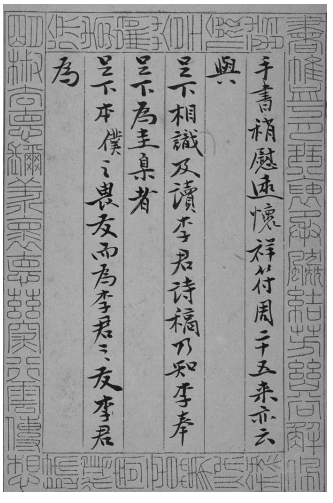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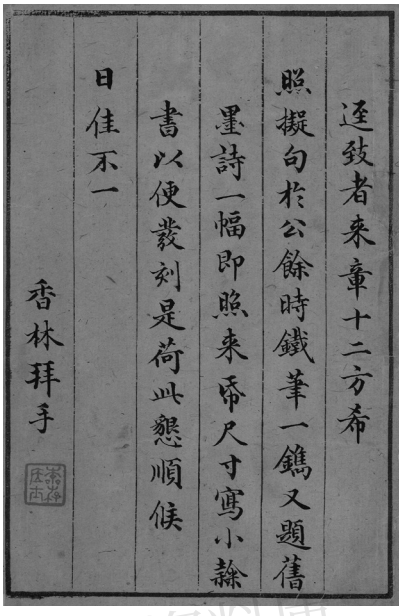


圖17 錢坫　《致黃易》　《黃小松友朋書札》第四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18 黃易　《仿金農畫竹》　《黃易書畫冊》　無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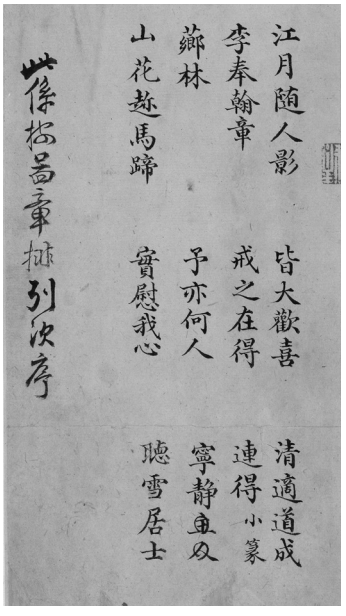


圖19 李奉翰　《致黃易》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三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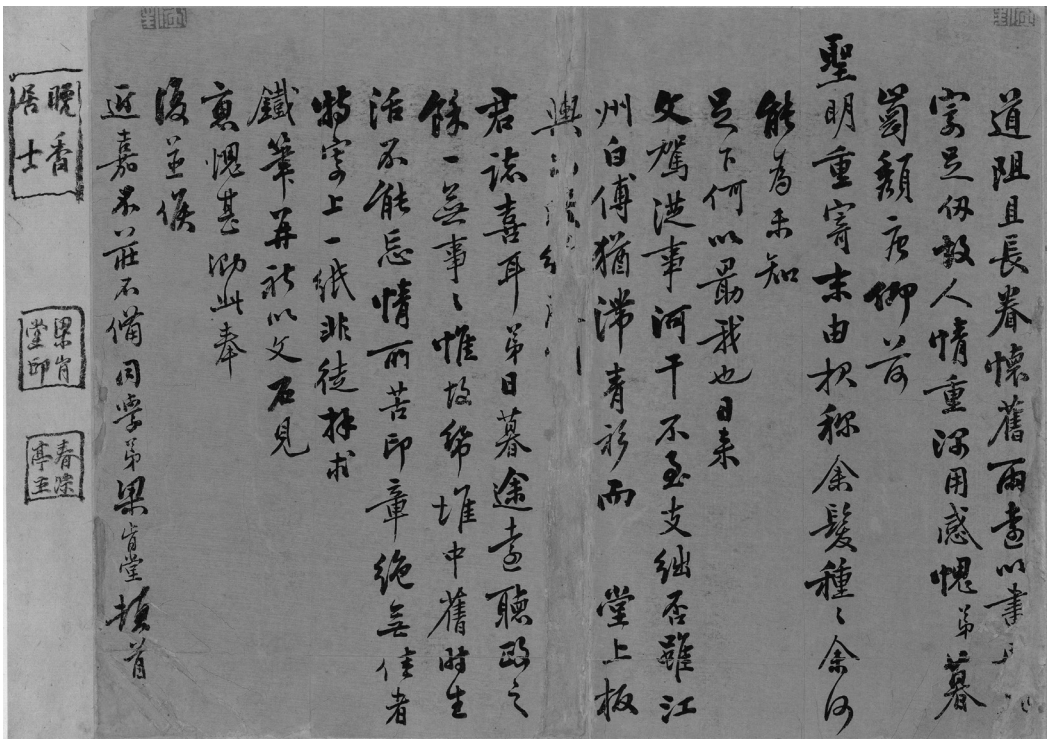


圖20 梁肯堂　《致黃易》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二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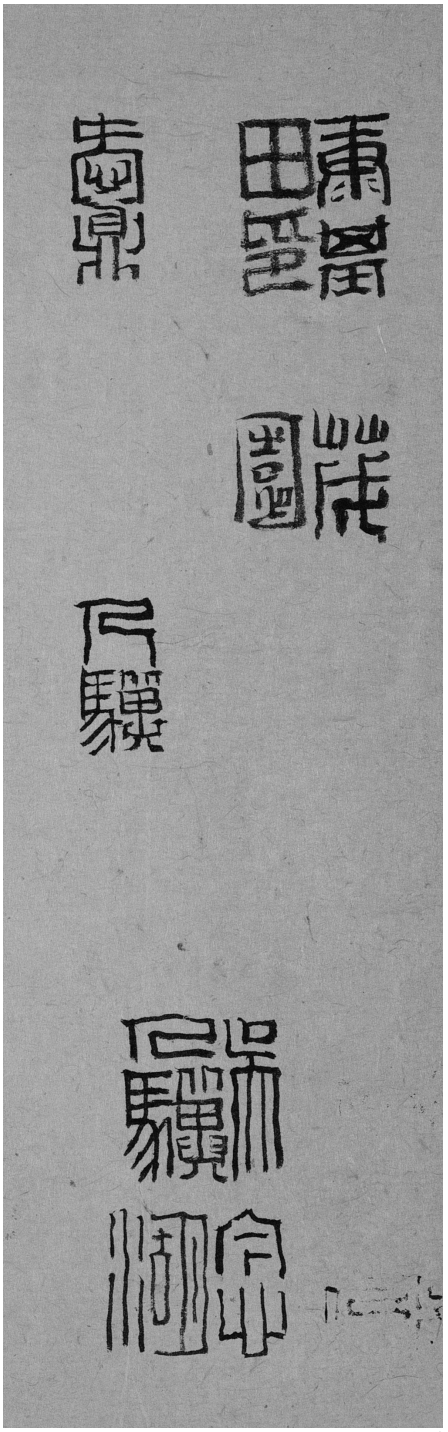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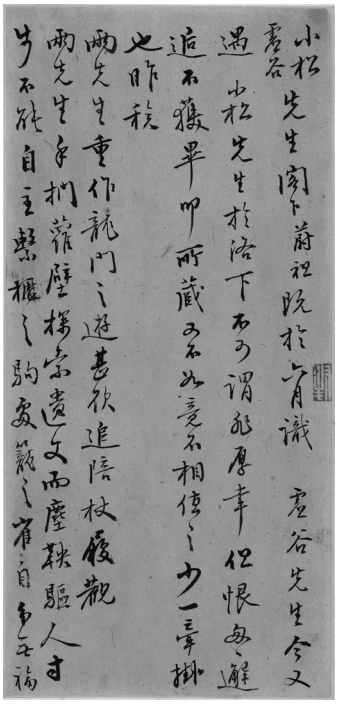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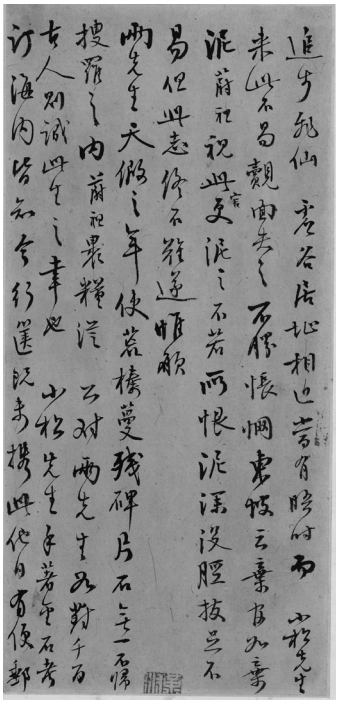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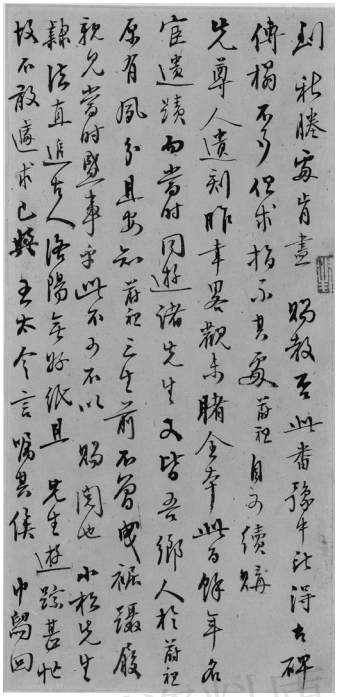
圖21 黃易印稿「人驥」、「吳人驥」、「念湖」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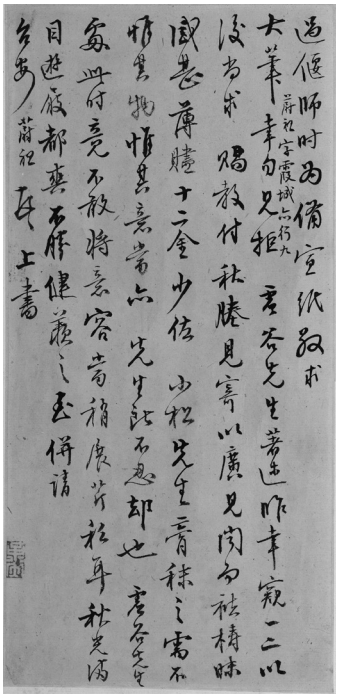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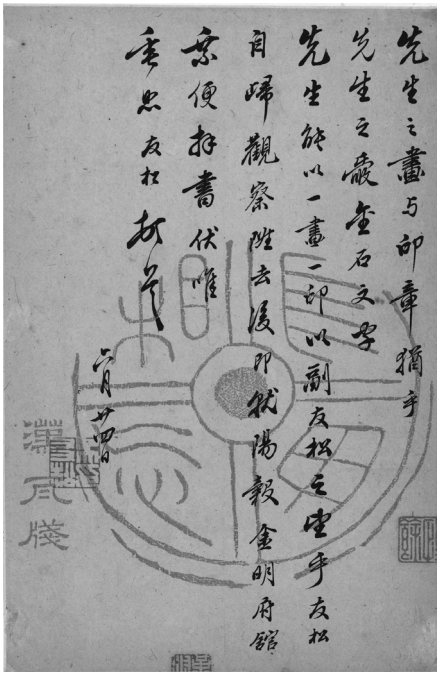
22-2

圖22 鄒蔚祖　《致黃易》　《小蓬萊閣同人尺牘》第三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3-1



23-2

圖23 吳友松 《致黃易》 《小蓬萊閣同人往來信札》第一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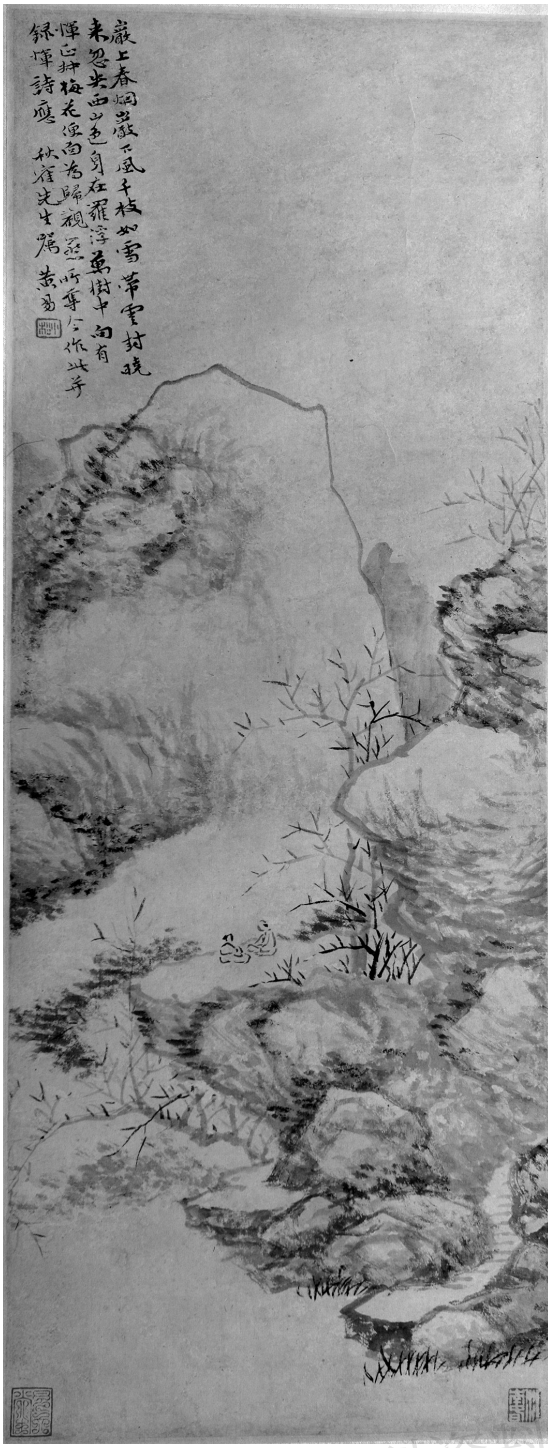


圖24 黃易贈吳友松《梅花軸》　蘇州篤齋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e Local Officials in Huang Yi's *Jinshi* Collecting

Xue, Long-chun
Academy of Art and Archae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The Qian-Jia period far exceeded the early Qing dynasty (1644-1735) in terms of both the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in collecting *jinshi* and the scale, category, and amount of *jinshi* collection. Huang Yi's (1744-1802) collection was the most prominent in the contemporary view. Promoted to the Vice Prefect of the Grand Canal of Shandong, a position not high in rank, Huang was not entitled to many political privileges and resources. Nevertheless, he managed to collect more than five thousand rubbings within a short thirty years, of which a great number were collected from provinces distant from Shandong, including Shaanxi, Sichuan, Hunan, Hubei, Jiangxi, Fujian, Guangdong, and Xinjiang. What made it possible to collect these *jinshi* rubbings nationwide rapidly when the market had not matured? Through studying th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ang Yi and his friend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local officials in Huang Yi's social network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his rubbing collecting activities. As the administrator of a particular region, a local official had adequate power and convenience in probing information about *jinshi*, sending people to make rubbings, as well as offering needed assistance. Furthermore, Jining of Shandong, where Huang Yi held his post, was one of the hubs of the Grand Canal which provided permission release, escort, and reception for the local officials and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who passed by. These services became either an opportunity for Huang Yi to commission rubbings or a means to repay favors. Meanwhile, unlike his contemporaries like Weng Fanggang and Sun Xingyan who solely specialized in calligraphy, Huang Yi's fame in calligraphy, painting, and seal carving gave him more advantage in social engagement. Hence his artworks kept motivating the local officials to collect rubbings for him, whether to be presented as gifts or simply as a gesture of reciprocation.

Keywords: Qianlong, *jinshi* collecting, rubbing, Huang Yi, local official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